

北外70周年 **特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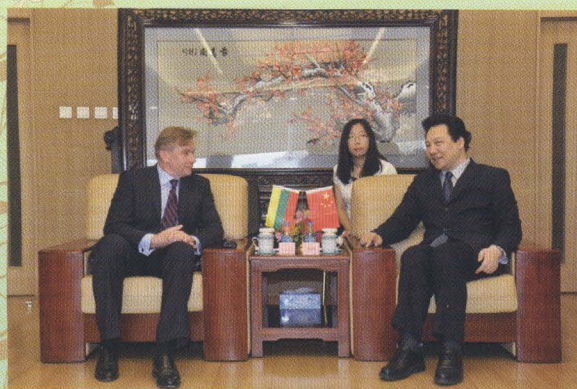
校友 通讯



我校校长陈雨露代表学校授予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名誉博士学位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来访我校



我校校长陈雨露与立陶宛外长奥德罗纽斯·阿茹巴利斯亲切交谈



马来西亚副总理丹斯里·慕尤丁·亚辛来访我校



杨学义书记率团访问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



陈雨露校长参加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与国家领导人合影



教育部直属高校改革试点（共建）项目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3月1日上午，由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司组织的直属高校合作共建改革试点项目座谈会在我校召开。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司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出席会议。北京外国语大学、河海大学等8所直属试点高校代表参加座谈，并作交流发言。

会上，我校副校长彭龙结合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实施精神，对北外承担的“探索地方、行业、企业合作共建新模式”试点项目的成因、内容和具体实施安排作了介绍。



汤森路透专业信息集团与我校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月15日上午，汤森路透中国区主席 David A Schlesinger、汤森路透法律信息集团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兼总代表姚颂柏先生、汤森路透法律信息集团中国区销售和市场总监宋逸峰先生、美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保罗安德森大法官、全美律师协会法学图书馆委员会主任、法学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郝兰琼教授及汤森路透社其他代表前来我校访问，并与我校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书。我校党委书记杨学义、副校长钟美荪接待了来访一行。杨书记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并对汤森路透集团给予我校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我校承办的第17所孔子学院——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隆重揭牌

3月31日，我校承办的第17所孔子学院——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隆重揭牌。我校党委书记杨学义教授、孔子学院工作处张晓慧处长、俄语学院史铁强院长、国际交流处刘博然副处长赶赴莫斯科参加了典礼，并出席了第二天召开的孔子学院理事会议。

俄国家杜马副主席梅里尼科夫、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出席仪式，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与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校长哈列耶娃共同为孔子学院揭牌。杨学义书记在贺辞中指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将积极贡献自身优势资源，同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共同为孔子学院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我校举行“科威特文化周”活动

为庆祝我国与科威特国建交 40 周年，科威特国驻华大使馆和我校联手举办科威特文化周活动。4 月 14 日下午，校党委副书记姜绪范会见了科威特国驻华大使穆罕默德·祖维赫先生等一行，并与穆罕默德·祖维赫大使一起为在我校千人礼堂门口举办的科威特文化展览剪彩。



当晚，“科威特歌舞之夜”晚会在我校千人礼堂拉开帷幕，姜绪范副书记和穆罕默德·祖维赫大使先后致辞。

本次科威特文化周是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见证，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一次盛会，将为中科两国各领域的交流、加强中科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提供契机。

我校陈雨露校长应邀参加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

4 月 14 至 16 日，应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的邀请，陈雨露校长赴海南博鳌参加了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



会议和开幕大会。会议的主题为“诠释增长：公平、协调、和谐、共享”。与会者们从“机会平等”、“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超越自我迎接下一个时代”等四个方面就亚洲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问题、摆脱危机后的增长和发展应遵循什么样的理念以及如何解读各国领导人共同倡导的包容性发展问题展开了讨论。

大会前，陈校长与其他 35 位代表一起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在博鳌期间，陈校长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经济频道，新浪网和网易等多家媒体的采访。

温家宝总理召开青年座谈会，我校同学代表青年学生发言

5 月 3 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开首都各界青年代表座谈会，我校英语学院 2009 级孙余骁、欧语学院 2007 级孟笛遥两位同学参加。座谈会上，温总理回顾了北外的办学历史，充分肯定了我校取得的成绩。总理指出，北外建于延安，建于革命的风雨之中，为中国的



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是为新中国的外交战线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例如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现任驻美大使张业遂、中国第一位女外长傅莹都是北外的校友。总理说，今年是北外 70 周年校庆，请参加座谈的同学转达他对北外老师、同学、校友的良好祝愿。

孙余骁同学作为青年学生代表首先发言，他根据我校人才培养模式，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一主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要将学习和研究、知识学习和社会实践、个人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总理肯定他的发言和我校在人才培养中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在三个结合的基础上，还要将中国文化与世界经典相结合，因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温总理还进一步指出，外语是重要的交流工具，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离不开外语人才。但青年人学外语不仅仅要掌握一门语言，更要学会相关知识，要努力成为复合型的人才。他嘱咐青年人学外语要赶紧，要趁早，要把外语学好。

座谈会最后，温总理进行了总结，并对青年人提出了五点要求：有理想，善学习，讲道德，要自立，勇奋斗。

温家宝总理在五四青年节前夕主持召开青年代表座谈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青年成长的关心和爱护。总理在座谈会上对我校的人才培养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我校同学表示，总理的讲话让自己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不辜负大好的青春年华，一定牢记总理的教导，用扎实的行动和优异的成绩回报党中央、国务院对大学生的关怀和厚爱。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专门用途英语专业委员会在我校成立

5月7日，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专门用途英语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孙友忠教授当选为首届会长并作了工作汇报。他在报告中回顾了专门用途英语专业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并对委员会今后的发展规划进行了展望。

我校校长、研究会会长陈雨露致词。与会者也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对专门用途英语专业委员会的发展提出了看法和建议。最后，陈雨露校长、金莉副校长分别向专门用途英语专业委员会会长孙友忠教授和全体常务理



事颁发了聘书。

我校与井冈山建立市校战略合作关系

5月16日—17日，应井冈山市市委、市政府的邀请，我校杨学义书记率队赴井冈山，与井冈山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并参加井冈山干部外语培训开班仪式。党委副书记文君、党办校办副主任汤哲远、网络教育学院副院长刘淑艳、网络教育学院教师高春丽副教授陪同前往。

我校党委副书记文君代表北外与井冈山市委组织部部长雷科签署了“井冈山-北京外国语大学战略合作备忘录”。根据战略合作备忘录，我校可在井冈山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我校网络教育学院副院长刘淑艳与井冈山市政府副市长杨春霞签署了“井冈山-北京外国语大学干部英语培训协议”。

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续约签字仪式举行

5月20日下午，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续约签字仪式在办公楼一层大厅举行。联合国负责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沙班先生（Shaaban M. Shaaban）专程来到我校参加签字仪式。签字仪式由我校副校长金莉主持，陈雨露校长和沙班副秘书长分别代表联合国和北外在续约协议上签字，并在热烈的掌声中交换了协议文本。

联合国首次与我校签署合作备忘录是在2008年上海召开的世界翻译大会上。本次合作期限的延长，将会加深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为建立稳固的合作模式奠定良好的基础。



中欧青年辩论赛全国选拔赛在我校举行

由全国青联主办，我校团委、英语学院承办的中欧青年辩论赛全国选拔赛在我校举行。全国60所高校的代表队参加了此项赛事。本次选拔赛采取英国议会制辩论的形式，选题涉及时政热点、青年参与和发展、中欧文化、中欧交流、中欧关系等多个方面，辩论语言为英语。

选手们围绕相关辩题展开激烈辩论，经过两天的比赛，产生了包括我校3支队伍在内的16支晋级队



伍，他们将参加于9月下旬在北外举行的中欧交流赛，届时将与来自欧洲的16支代表队同场竞技。

李岚清同志听取我校工作汇报

6月14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会见我校前校长、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我校党委书记杨学义、校长陈雨露、党委副书记文君，听取学校工作汇报，并与我校两任校领导进行



了亲切愉快的交谈。

学校领导向岚清同志汇报了我校教学工作和7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的情况，感谢岚清同志长期以来对我校改革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岚清同志对我校的办学质量、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我国公共外语教学存在的教学周期长、学习效果不佳的问题，希望北外积极探索改革思路 and 模式，切实加强外语师资培训，创新外语教学法，不断提高外语

教育质量和效率。他还十分关心北外艺术研究院的成立，并围绕艺术研究方方面面等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陈雨露校长出席匈牙利本土化汉语教材出版发布仪式

6月16日，陈雨露校长出席了匈中双语小学的孔子课堂挂牌仪式和匈牙利第一套本土化教材《匈牙利汉语课本》第一册出版发行会。陈校长指出：这种中外编写人员合作，中外出版机构合作，最终在国外发行的模式可以达到中外互动、优势互补，解决目前国内汉语教材针对性不强，难于在海外市场上发行的诸多困难。这是我校继与罗马大学合作编写《意大利人学汉语》后的第二次有益尝试。陈校长表示，我校将进一步完善这种本土化教材的开发模式，并把它推广到我校承办的其他孔子学院，力争在3-5年中使我校承办的孔子学院全部拥有自行开发的国别汉语教材。



“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夏令营开营

7月15日上午，“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我校办公楼配楼多功能厅举行。来自全国36所高校的125名优秀学子参加了开

营仪式。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日益广泛深入的新形势下，为适应国家对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战略需求，落实“高原+山峰”人才培养理念，探索外语人才培养与国际组织需要的高端专门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新模式，我校承担了首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项目“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模式项目”。此次夏令营旨在选拔优质生源，培养具有浓厚中国情怀与宽广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出色的外语和专业技能的复语型、复合型高端人才。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校党委书记杨学



义，副校长金莉，我校董事会副董事长、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方仪，胡文仲、张中载、梅仁毅等资深教授。开营仪式由研究生处处长陶家俊教授主持。

斯里兰卡总统访问我校，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并为斯里兰卡研究中心揭牌

8月11日上午，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率领先代表团访问我校，接受我校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为斯里兰卡研究中心揭牌。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斯里兰卡外交部部长佩里斯，斯里兰卡高等教育部部长迪萨纳亚克，斯里兰卡驻华



大使兰杰特·乌杨，校党委书记杨学义，校长陈雨露，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杨秀萍，前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江勤政，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孙卫东，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曹文泽，党委副书记姜绪范、文君，副校长彭龙，校长助理孙友忠、杨建国、斯里兰卡代表团成员以及我校师生代表参加了学位授予仪式。仪式由党委书记杨学义主持。

陈雨露校长致欢迎辞，对总统一行对我校的访问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陈校长回顾了中斯两国深厚交往的历史渊源，他表示，北外与斯里兰卡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流合作，此次总统阁下访问北外并接受北外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是北外的荣誉，一定能够激励中斯两国青年立足本职、放眼国际，在投身国家建设的同时，努力为沟通世界文化、促进世界和平做出贡献。陈校长宣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同意授予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总统名誉博士学位的决定”并为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总统颁发名誉博士学位证书和斯里兰卡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聘书。

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总统进行了演讲，回顾了中国与斯里兰卡几千年来友好交往的历史，介绍了僧伽罗语的由来与发展，并对在场的僧伽罗语专业学生提出了希望。他表示，学习僧伽罗语对于加强中斯两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青年学有所成，祝愿中斯两国友谊万古长青。

学位授予仪式结束后，总统一行来到位于办公楼二层的我校新成立的斯里兰卡研究中心。陈雨露校长与总统先生共同为斯里兰卡研究中心揭牌，红色的绸缎徐徐拉开，标志着国内第一个斯里兰卡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巴西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我校

8月17日上午，由巴西高等教育人员促进会副秘书长杰拉德·努内斯博士率领的巴西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我校。巴西教育部官员、巴西多所高校校长以及巴西驻华大使馆的相关工作人员随团前来访问。

陈雨露校长会见了代表团一行。陈校长向代表团



介绍了我校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情况并重点介绍了我校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系的建设和发展。陈校长表示，近年来，中巴两国经贸、政治关系发展迅速，但在人文方面的交流急待加强。作为全国最早开设葡萄牙语专业的高校，北外希望能够利用多年来在葡萄牙语教学、巴西研究等方面积累的成果经验为促进中巴两国的人文交流做出贡献，从而全面推动中巴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代表团团长、巴西高等教育人员促进会副秘书长杰拉德·努内斯博士对我校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加强葡语学习和研究对于两国的交往具有重要作用，北外葡语专业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希望通

通过此次访问能够加强巴西高校与北外的合作交流，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进而促进中巴两国的人文交流。

国际处处长李又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西葡语系党总支副书记张琳、国际处副处长李辉等参加了会见。

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暨第6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11年8月24日上午，由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主办，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承办的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暨第6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在我校隆重开幕。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文秋芳教授、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主席 Martin Bygate 教授、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副主席 Bernd R. U. Schoff 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金莉教授主持开幕式。

陈雨露校长首先致辞，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



者表示热烈欢迎。陈校长指出，应用语言学正在蓬勃发展，在大会“多样中的和谐：语言、文化和社会”主题下，各位专家、学者必定能够充分沟通、深入探讨，继续开拓合作领域，为应用语言学的发展探索创新之路。此次大会的举办也将为即将迎来70周年校庆

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增添光彩。最后，陈校长祝愿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文秋芳教授，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主席 Martin Bygate 教授分别致辞。文秋芳教授表示，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在2005年申办大会成功，是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首次来到中国。自申办成功以来，研究会和各方进行了数年的精心筹备与组织，力争为全世界与会者奉献一场高质量的学术盛会。Martin Bygate 教授对为会议举办做出不懈努力的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承办方表示感谢。他表示，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实证性的学科，因其广泛的包容性不断发展，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和各国分支机构也推动着应用语言学紧跟时代步伐，朝着新的研究领域发展。相信本次大会一定能够取得卓著成果，圆满成功。

最后，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致辞，对大会的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前来参加本次盛会的各国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刘利民副部长表示，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来重视语言文字的教学研究和实践。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首次来到中国，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必将对世界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将有助于与会的各国朋友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加深理解，增进友谊，并对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开幕式结束后，大会发言与研讨正式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顾曰国教授在大会上首先以“经验语言学：语言作为生活经验的研究”为主题做主旨发言。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来自63个国家的1500余位语言学专家围绕“语言习得与加工”、“语言教学”、“不同职业中的语言”、“社会中的语言”、“应用语言学与方法论”等分议题，以主旨发言、特邀专题研讨、专题

研讨、工作坊、分组发言和论文宣读等形式，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是国际应用语言学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盛会，此次大会是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首次来到中国，主题是“多样中的和谐：语言、文化、社会”。

我校五位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2010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日前公布，我校施建军、孙文莉、陶家俊、谢韬和应惟伟5位教师入选该计划，这是我校获该计划资助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是教育部设立的专项人才支持计划，支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开展教学改革，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和国际科学与技术前沿进行创新研究。

我校西班牙语专业在全国西语专八考试中获得佳绩

在2011年全国西班牙语专业八级水平测试中，我校西葡语系西班牙语专业同学成绩优异。参加测试的48名同学平均成绩为110.5分，高出全国平均成绩17分。其中，6名同学获得“优秀”，占全国获“优秀”学生比例的33%，29名学生获得“良好”。西班牙语专业07级的张彦雯、顾欣、何莹三名同学均以125分以上的高分获得全国一、二、三名。

长期以来，我校西班牙语专业不论在整体水平还是在个人成绩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今年是西语专业八级水平测试设立以来，我校第一次包揽前三名，也是西语专业八级水平测试历史上第一次由同一所高校包揽前三名。

亚非学院副院长孙晓萌受邀在英国皇家非洲协

会演讲



2月8日，亚非学院副院长孙晓萌副教授受英国皇家非洲协会（Royal African Society）的邀请，赴伦敦作题为《中国的非洲语言与文化研究：历史、现状与挑战》演讲。此次演讲共吸引了来自包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与文化系、人类学系、发展学研究中心、伦敦政经学院政治学系、挪威大学社会科学系多位专家学者到场。孙晓萌表示，非洲语言与文化是非洲身份认同的奠基石，非洲本土语言与文化研究是打开理解非洲文化的窗口、搭建中非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手段，为增进中非文化交往、促进中非友好关系做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

孙晓萌此行还走访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和查塔姆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并分别就课程共享、远程教学、文献互借，学术讲座电子资源分享等合作事宜展开会谈。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陈雨露校长文章

201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陈雨露校长撰写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五个核心问题》一文，发表在《中国金融》2010年第19-20期，并被《新华文摘》2011年第2期全文转载，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

文章认为，在冲破“二元经济”结构，实现更高

水平增长的过程中，农村金融需要在“三农”领域有所作为。对于中国而言，农村金融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存在于区域和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纽带”中，还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体制长期约束所造成的“路径依赖”中，甚至渗透于深受历史文化传统影响的某些特殊的经济行为中。这些彼此交结的现实因素，不仅是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复杂性之源，更是我们正确解读中国农村金融现状与未来发展的“起点”和初始条件。

北京外国语大学汉学中心李雪涛教授在德国国家科学院做“轴心时代与中国之互动”的公开演讲

2011年3月1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汉学中心李雪涛教授在德国位于哈雷（Halle）的国家科学院（Leopoldina National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做了题为“轴心时代与中国之互动”（Achsenzeit und China wechselseitige Wirkungen）的德文公开演讲。

李雪涛在演讲中认为，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文明之梳理，在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印度和希腊三种文明是以何种方式达到“统摄”（das Umgreifende）的。而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在达至终极真理的方式方面，给予了雅斯贝尔斯以极大的启发。尽管“轴心时代”的观念一直到1949年雅斯贝尔斯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才为学术界所接受，但这一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雅斯贝尔斯对亚洲的哲学与思想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一观念形成之后，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大学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阿语系教授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客观分析中东局势

近日，我校阿语系张宏教授、薛庆国教授、刘欣路教授撰写的《中东动荡也在提醒中国发展》一文，

发表在3月22日《环球时报》14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文章认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国情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将步其后尘爆发“革命”的说法完全不合实际。仅以西方的“民主标准”为参照，认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境遇相同是极为偏颇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东动荡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张西平教授、文铮副教授受邀做客央视《文化正午》节目，畅谈中国文化走出去

在建校70周年之际，为了展示我校学术成就，弘扬北外的学术传统，我校亚非学院院长、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和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文铮副教授应邀先后做客央视《文化正午》节目。两位学者以我校赴意大利举办巡演、巡展、巡讲活动和海外孔子学院建设为切入点，围绕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中国和意大利文化交流的故事以及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等问题进行讨论和解读。

《环球时报》刊发我校张志洲教授文章：小心互联网撕裂中国

我校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志洲4月14日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小心互联网撕裂中国》。文中提到：由于网络舆论会把一些平常的问题与矛盾无限放大，这对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的中国自主性的重建社会核心价值，无疑有巨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中国该如何化解网络新媒体带来的社会公共舆论分裂的隐忧呢？对此，张志洲研究院提出了自己的三点意见。文章最后指出，只要国内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被普遍感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普遍认同，关于社会改革举措和前进方向有共识，公共舆论自然会重新凝聚，外来干预也就失去操作空间。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访问我校并发表演讲

9月9日下午，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来到我校访问并发表演讲。

下午3时，大使先生一行抵达北外，受到在场学生的热烈欢迎。党委书记杨学义，校长陈雨露，副校长钟美荪、金莉，校长助理孙有中等会见了大使先生一行。



在会谈中，陈雨露校长表示，大使先生把到任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放在北外举行，将为北外七十周年校庆添上华彩的一笔。陈雨露校长向骆家辉大使介绍了我校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着重介绍了我校美国研究中心的建设发展、我校与美国驻华使馆以及美国高校的交流合作情况，期待继续加强与美国使馆在文化、教育、美国研究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增进两国青年人的了解，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骆家辉大使对学校的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表示感谢。他说，刚才在车里观察北外的校园，发现北外不仅学术氛围浓厚，校园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骆家辉大使介绍了中美两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情况，他表示，北外在中美政治、文化交流等方面成绩斐然，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北外的毕业生在学术、外交等领域都表现得非常优异，希望能够加

强与北外的合作，在商业、政府、社会、文化等领域培养更多人才，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下午4时15分，骆家辉大使在逸夫楼第三阶梯教室发表演讲。主持演讲会的陈雨露校长指出，为了持续传承弘扬北外开放的学术传统和精英教育理念，在新世纪的前10年中，学校一共聘请了150多位各国领导人和驻华大使来到学校，为同学们做公开演讲，这已经成为一个深受同学喜爱的思维激荡平台。骆家辉大使是2011新学年的首位演讲人。

“大家好！”骆家辉大使使用中文和现场观众打招呼，引发热烈掌声。骆家辉大使对学校的热情邀请与精心准备表示感谢，并对北外70周年校庆表示衷心祝贺。他表示，作为中国顶尖的外语类高校，70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国际化人才，数百位中国驻外大使都来自北外，现任中国驻美大使也是北外的校友。北外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题为“美中关系的未来”的演讲中，骆家辉大使从经贸往来、防务关系、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等角度阐述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骆家辉大使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对于世界经济、政治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双方应当加强对话、促进理解、增进互信、扩大交流合作，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骆家辉大使指出，北外同学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接触不同的文化，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一定会产生大量的创新思维。希望北外同学保持开放包容的理念，继承北外校友的优秀品质，不断努力，为中美关系的未来作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校党委书记杨学义代表学校向骆家辉大使赠送了中国传统的牡丹图，祝愿中美两国友谊长青，国家和平繁荣。

北外大事记

1941年3月 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成立俄文队；不久，发展为俄文大队（下属一、二、三队）。

1941年12月 俄文大队转为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

1942年6月 军事学院俄文科调整为军委俄文学校。

1944年6月 增设英文系，俄文学校改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

1945年8月 抗日战争胜利，延安外国语学校师生分批离开延安，前往东北、华北解放区。

1946年1月 到达张家口的部分延安外国语学校师生，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内成立外语系。

1946年6月 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师生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华北联大的外语系一起成立外国语学院，设英语、俄语两个系。

1946年12月 因战争学校转移至冀中束鹿县路过村。

1948年5月 学校迁至河北省正定县。

1948年6月 以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师生为基础成立外事学校，校址在冀中获鹿县南海山村。

1948年8月 晋察冀的华北联合大学与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改名华北大学。联大的外国语学院与北方大学的外文班，也合并为华大二部外语系。

1949年1月 北平解放。

1949年2月 外事学校进城。

1949年4月 华北大学二部进城。



1949年6月 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与外事学校合并，学校改名为外国语学校。

1949年10月 成立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1950年3月 外国语学校增设德文组和法文组。

1951年2月 外国语学校俄文部并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1952年3月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成立留苏预备部。

1953年2月 外国语学校成立西班牙文组，与德法文组合为德西法文系。

1954年8月 外国语学校经高教部呈请国务院批准，改称北京外国语学院。

1955年6月 经高教部呈请国务院批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改为北京俄语学院。

1955年7月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并入北京俄语学院。

1956年8月 北京大学波兰语、捷克语班调整到北京俄语学院，成立波捷语系。

1956年9月 根据中罗文化协定，北京外国语学院增设罗马尼亚语专业。

1959年2月 根据中央决定，北京外国语学院与北京俄语学院合并为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设有六个系八个专业（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波兰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和一个留苏预备部。

1959年9月 成立附属中学。



1960年9月留苏预备部撤消，成立外国留学生办公室。

1961年12月筹建亚非语系。

1962年8月正式成立亚非语系。外交学院阿拉伯语、日语、印尼语、德语专业分别并入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和德语系。

不久，德语系与东欧语系合并。

1963年9月附属中学扩展成为包括中学部（高中、初中）和小学部（小学三年级以上）的附属外国语学校。

1964年9月学校发展为全国语种最多的高等外语专业学院，设有六个系（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亚非语、东欧语），27个语种（英、俄、德、法、西、瑞典、葡、意、日、阿（拉伯）、越、老、柬、泰、印尼、马来、缅甸、僧加罗、豪萨、斯瓦希里、波、捷、罗、匈、保、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停课，停止招生。

1970年4月迁校至湖北沙洋，办“五七干校”。

1971年8月恢复招生。

1971年10月第一批工农兵学员800人入学。

1972年8月全校迁回北京。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

1977年7月恢复经过考试的统一招生。

1977年10月经过考试招收的第一批新生256人入学。

1979年2月国家把联合国总部要求培训翻译人员的任务交给我院，在英语系下成立“联合国译员训练班”。

1979年8月建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0年2月建立“外语教学资料中心”。

1981年2月原有六个系扩展为九个系，日语、阿拉伯语专业脱离亚非语系，独立建系。一度并入东欧语系的德语专业，又独立建系。

1981年12月正式建立外国留学生汉语进修部。

1983年6月开办夜大学，学制三年，设有英、俄、德、法、西、日、阿（拉伯）等语种。

1983年9月受中宣部和教育部委托，开办“国际文化交流班”。

1984年3月成立“外国语言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

1984年9月建立“土耳其语”专业，至此全院共设有28个语种。

1984年9月外国留学生汉语进修部与直属中国语文教研室合并为汉语部。

1984年9月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独立建制，改为联合国译员培训部。

1984年9月成立北京外语音像教材出版社。

1984年10月开办函授部，计有英、俄、德、法、日、阿（拉伯）等语种。

1985年9月建立“日本学研究中心”和“出国人员培训部”。

1985年10月由于英语系负担的任务过重，成立英语二系。

1985年增设对外汉语和图书馆信息管理两个专业，并于当年开始招生。

1994年经原国家教委（现为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弘扬传统、展示成就、凝聚群志、再铸辉煌

——曹文泽副书记、副校长谈 70 周年校庆



记者：曹书记，您好！今年是北外建校 70 周年，学校校庆筹备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

曹书记：首先，我要代表杨学义书记、陈雨露校长感谢各位校友一直以来对母校发展的关注和支持，也要代表学校欢迎海内外校友回家，与我们共忆青春岁月，共叙同窗情谊。

70 周年校庆筹备工作从 2010 年 9 月学校成立校庆活动领导小组就正式启动了。领导小组由杨学义书记、陈雨露校长担任组长，党委副书记姜绪范、文君，副校长钟美荪、金莉、彭龙，校长助理杨建国、孙有忠担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 70 周年校庆办公室和 11 个专项工作组，分别负责学术科研、校史编撰、形象建设、校友联络、新闻宣传、校园文化活动、国际交流、资金筹措、校园建设、安全保卫等工作。随着校庆日的临近，又增设了庆典大会组、文艺晚会组、校庆接待组、文字工作组、后勤保障组等专项工作组。

校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学校各部门正按照工作分工，认真筹备，期盼着 9 月 24 日每一位校友都能回母校看看。

记者：谢谢曹书记。70 周年校庆有什么特殊意义？

曹书记：201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起步之年。北外 1941 年成立于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外语院校。70 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北外栉风沐雨、艰苦创业，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决定举行建校 70 周年庆典，也是向党的生日献礼。

我们要利用校庆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全面总结办学经验，彰显北外特色，弘扬北外传统，推广北外品牌，提高北外声誉，扩大北外影响，将 70 年来铸

就的光辉业绩转化为进一步发展的奠基石，将70年来沉淀的宝贵经验转化为新时期发展的新动力，加快建设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外国语大学的步伐。

70周年校庆的主体是广大在校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我们要以校庆为平台，为全校师生和海内外校友了解校史、继承传统、弘扬校风服务，增强全校师生的归宿感、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全校师生为实现办学目标而共同奋斗的凝聚力、向心力，把他们的热情和自豪感转化为建设好学校的实际行动，促进学校各项事业繁荣发展。

记者：今年校庆活动的亮点、重点有哪些？

曹书记：正因为我们要通过校庆这种形式和载体，宣传学校，凝聚人心，增强信心，抓住机遇，促进学校发展，所以杨学义书记、陈雨露校长提出要办一届“高水平、有特色、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印象深刻”的校庆。在具体的筹备工作中，我们坚持“突出‘一外’、强调‘两浓’、力争‘三多’、办好‘四大活动’”的思路。

“一外”指的是要突出北外的办学理念、办学成果和国际化办学特色。

“两浓”，一指学术氛围浓，要围绕建设学术强校的目标，通过举办大型的学术活动，展示北外的学术成就，弘扬北外老中青三代的学术传统，培养后备学术骨干。二指校友师生情意浓，要充分调动全校师生的积极性，广泛发动全校师生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主人翁意识参与到校庆工作中来，邀请尽量多的校友返校参加校庆活动，增强凝聚力，促进学校发展。

“三多”指使节多、贺信多、校友多。一是要邀请外国驻华使节、中国驻外大使、参赞等参加校庆

活动。二是要邀请国际组织、外国政要、国内有关单位领导等为校庆写贺信。三是要健全校友数据库，密切联系校友，广泛宣传，力争返校校友多。

“四大活动”指简约高雅的校庆庆典大会（含校庆文艺晚会）、校庆招待会、精品校园创建活动和“拯救北外历史”行动。校庆庆典大会（含校庆文艺晚会）、校庆招待会风格要简约高雅，营造平等、和谐的环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精品校园创建活动是指通过70周年校庆，加快校园建设步伐，努力打造“绿化、美化、数字化、人文化、国际化、低碳化”的精品校园；“拯救北外历史”行动要通过走访北外的老领导、老教师、老专家和老校友等，留存北外的“口述史”。

在北外70周年校庆之际，母校诚挚欢迎各位校友返校，与我们共庆历史时刻，共话母校发展。



俄语学院史铁强院长谈七十年院庆工作

乔 扬



2011年9月，在北外七十周年之际，俄语学院也迎来了建院七十周年。就院庆的安排和准备工作，我们采访了俄语学院史铁强院长。

史院长向我们介绍，2011年上半年俄语学院已经完成了若干个大使学术讲座，下半年还将举办此类学术讲座及杰出校友讲座。九月份，俄语学院将举办俄罗斯文学国际研讨会，会议将有七八十位中外代表、著名学者参加，配合学校的校庆活动，还有一系列的大使返校开展学术讲座。

俄语学院与北外同庆七十年生日，为配合校庆，俄语学院的院庆活动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校庆活动当天下午将举办俄语学院校友联谊活动，邀请在职老师、领导和所有返校的校友们参加；二是制作俄语学院七十周年纪念短片，回顾学院七十年历史，介绍学院今日风采，短片将在联谊庆典活动上播放；三是编写纪念俄语学院七十周年文集，收录

1941年学院成立以来各个年代校友的回忆性文章。

此外，学院还将举办三个展览：一是七十年历史图片展，展览学院各个时期的照片；二是绘画展，学院教师的个人绘画展；三是学生的摄影作品展。

目前，纪念俄语学院七十周年文集已编辑完稿，大约三十万字，已交付出版社。七十周年纪念短片的资料搜集工作也已经完成，进入制作阶段。纪念短片将从历史角度纵向展示俄语学院自1941年成立以来走过的几个历史阶段、涉及的历史性人物、历届的院系主任、重要的教师教授和重大的学术科研成果。同时，也将横向展示俄语学院教学、科研、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成果和现状。短片将从纵横两条线、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俄语学院的风采。短片中包含许多真实的历史照片和视频资料，这些将生动地展示俄语学院七十年发展历程。

在整个院庆工作的筹备中，校友名录制作工作

贯穿始终，学院发动了离退休教师 and 在职教师一起做校友信息整理工作，联系校友。

史院长谈到，院庆工作也面临一些困难，如准备时间较短、人手较少、教师们的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比较重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几位老师勇敢承担起这一重任。另外，收集历史久远的资料和联络老校友是院庆工作的难点。针对其中的种种困难，学院专门召开了几次座谈会进行协调解决。

为了更好地收集历史资料，学院邀请离退休教师帮忙出主意、请他们撰写回忆录并派学生去老教师家里进行采访和拍摄珍贵照片。由于有的老教授年事已高，所以进行采访之前学院先设计好了问卷及问题，以便于让老教师们通过回答问题的形式回

忆起以前在北外学习和工作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形成宝贵的历史资料。老教师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采访学生，积极地配合院庆工作的需要，尽最大努力提供照片等资料，为院庆工作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采访中，史院长多次强调，学院充分把握七十年院庆的机遇，系统地整理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样，老校友和刚毕业的校友们就都能够看到俄语学院走过的历史和成长历程，同时俄语学院教学、科研、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成果和现状也能得到充分的展示，这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预祝俄语学院的院庆取得圆满成功！



专访国际商学院副院长牛华勇国商十年院庆工作

乔 扬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2011年国际商学院恰逢十周年院庆。短短十年里，国际商学院已经发展成为本科生规模最大的学院，学生在专业学习、综合能力方面都有出色表现。国际商学院将以什么理念，以何种形式来庆祝院庆，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采访了国际商学院副院长牛华勇。

采访一开始，牛副院长就告诉我们，学院做院庆，不只是展示成就，更多的是总结十年来的办学经验，展望未来的美好前景。国际商学院院庆有两个特点：一是重在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北外国际商学院的特点是年轻，成立时间短。学院借院庆之机将会采访许多教师、毕业生和在校学生，以总结经验，为以后制定五年或十年的发展战略提供支持。二是平民化，贴近老师、同学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希望在接受赞美和祝福的同时也接受建议与批评，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商学院发展。

牛副院长还向我们介绍了学院院庆的主要内容和进展。一是整理商学院十年的办学历史，目

前已经整理出几万张照片，几百个小时的视频；二是广泛发动校友参与院庆，现在已经成立了北京地区和上海地区商学院的校友会，举办了联谊活动；三是分年级整理校友信息，组织活动，通过每个年级的级长寻找班长，再通过班长联系每个同学，让同学们尽可能多地来参加校友活动；四是学院组织在校生团总支、学生会的同学们进行头脑风暴，积极创新，为院庆出点子，做工作；五是学院将做一个全体老师的采访，包括正在教学岗位上的教师和曾经在商学院工作现已调到其他单位的老师，从教师的眼中看商学院的成功和不足；六是学院还要对商学院校友做一个大规模的访谈，采访校友包括各行各业的校友，倾听校友建议，反馈校友意见；七是科研部门将针对在校生举办一系列的学术讲座；八是教学部门组织对老师的评选，选出同学们最喜爱的老师。

牛副院长告诉我们，学院希望借校庆院庆契机，组织新的校友活动，尝试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以前的讲座邀请校友分享应聘和大学规划的经验，多针对在校生。如今有一些校友在业内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地位，举办讲座时除了求学经验之外还可以分享如金融、会计、营销方面的职业经验，同时还可以形成一个高端的精英俱乐部，诸如北大清华的精英俱乐部。返校校友召开座谈会，探讨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吸引媒体界的注目，在学术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学院现在虽然还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可以借鉴这种形式。俱乐部建立之后，还可以向分行业、分领域的精英俱乐部迈进。此外，收集校友所在的企业对学院毕业生的反馈，多和学院接触，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学



院在企业的反馈中也可以了解我们毕业生的优势是什么，提高空间在哪里，更好地进行就业指导。

国际商学院的院庆和学校校庆恰逢一天，学院结合校庆安排做了一整天的活动计划，校友们上午参加学校庆典大会，下午举办商学院十周年院庆活动，活动会邀请所有返校毕业生、部分在校学生代表、学教师 and 用人单位代表参加。学院安排了专业人士制作十周年院庆视频，学生会还将设计十年院庆礼品、十年院庆纪念专刊。学院的文艺晚会将安排在校庆文艺晚会之前或之后。可以看出，国际商学院院庆准备工作充分，活动丰富多彩。

祝愿国际商学院的发展蒸蒸日上!



抚今追昔 继往开来 凝心聚力 再创辉煌

——亚非学院50周年院庆专访

为了回顾亚非学院50年发展历程，总结办学成就，扩大学院知名度，激发师生为亚非，爱亚非的精神，增强社会各界对亚非学院的关心支持、凝聚各方力量，推动亚非学院可持续发展，学院决定开展5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将院庆活动作为校庆活动的一部分。为做好院庆工作，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学院院务委员会研究院庆方案和一系列筹备工作。

亚非学院院庆活动以“隆重、热烈、节俭、务实”为宗旨，以“抚今追昔、继往开来、凝心聚力、再创辉煌”为主题，成立了以党总支书记杨晓京和院长白淳为组长的50周年庆典活动领导小组，小组下设12个工作组，分别负责校友工作与接受捐赠、教学科研成果展览、庆典纪念画册、国际交流活动、院庆文件起草、信息宣传、后勤保障、引导服务、庆典会场会务、礼仪接待、学生活动协调及礼品准备发放、校友签到等工作。

为了办好院庆50周年活动，学院上下齐心协力，全院师生满怀激情，积极投入到院庆的各项工作中

去。目前院庆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为配合校庆院庆工作，上半年亚非学院就积极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其中2011年6月1日在千人礼堂举办了较大规模的《中国-斯里兰卡文化交流》斯里兰卡知识竞赛决赛活动；2011年8月11日邀请斯里兰卡总统访问我校并和师生进行了亲切交流，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亚非学院院庆的主要活动有五项。一是在校庆当天下午召开院庆50周年庆祝大会。届时将邀请多位驻华大使、公赞及校友光临。二是在学院举办校友联谊活动。校友的联络、邀请正在进行中。三是举办亚非教学与科研成果展览、展示。四是在办公楼举办亚非学院专业发展与建设恳谈会。五是发放院庆论文集、庆典纪念画册、校友通讯录、纪念品等。目前，《树人致知 怀远——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创建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正在征集，庆典纪念画册、校友通讯录都在紧密的筹划和收集材料，纪念品已有雏形。

此外，学院还充分发挥广大学生的聪明才智，积极为学院院庆出谋划策。亚非团学联配合院庆编撰了《留学亚非》纪念册、开展了“我的亚非五十年”纪念衫设计大赛、老教授专访、《亚非五十年院刊》特刊、亚非五十年院庆歌曲创作及院庆吉祥物等。此外还将准备精彩的文艺节目表演。

亚非学院成立50周年是学院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为确保院庆各项筹备工作顺利开展，各工作组按照院庆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以务实、高效的态度，认真做好各项工作，以确保各项院庆活动圆满成功。

祝愿亚非学院的明天更加美好！



校领导看望伊莎白教授并转交温家宝总理亲笔信



5月4日上午，校党委书记杨学义、校长陈雨露一行看望了我校老专家伊莎白教授并向她转交了温家宝总理的亲笔信。

伊莎白教授一直关心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曾多次就我校的发展与温家宝总理进行交流。此次温家宝总理的亲笔信是对伊莎白教授之前信件的回复。

温家宝总理在信中回顾了北外成立70年来的风雨历程并表达了对北外70周年华诞的美好祝愿。此外，温家宝总理对伊莎白教授为中国外语教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她身体健康。

杨学义书记和陈雨露校长对伊莎白教授情系北外、关心学校发展表达了衷心的感谢。随后，陈校长向伊莎白教授介绍了学校近期的发展和规划，对校庆的筹备工作进行了简要的汇报。杨书记和陈校长表示，伊莎白教授是北外建设与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对学校的发展付出了心血和智慧，学校一定不会辜负社会各界的期望，为不断推进学校的发展而努力。最后，杨学义书记和陈雨露校长祝愿伊莎白教授健康、平安。

伊莎白教授对校领导的关心和问候表示感谢。伊莎白教授表示，70年来，一批又一批北外学子铭记“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在各条战线上为中国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如今的北外

又承担着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历史使命，责任更加重大，希望学校能够以校庆70周年为契机取得更加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校长助理孙友忠、党办校办主任贾德忠、宣传部部长赵宗锋、国际处处长苑建华等陪同前往看望。

李肇星校友访问学生宿舍与同学亲切见面

5月21日上午，在参加我校举办的翻译教育发展国际研讨会之际，我校校友、中国翻译协会会长李肇星来到他学生时代曾住过的东院3号楼302室



访问，并与302室的辛慧同学进行了亲切交谈。

在交谈中，李肇星提起了自己学生时代的生活，还谈到了当年宿舍的舍友，言语中流露出对学生时代的美好记忆和对母校的深切眷恋。李肇星还把自己的新书送给了辛慧同学，并在上面题字“为祖国辛而慧”，勉励同学们为祖国的欣欣向荣而努力学习。

文君副书记一行寻访广州校友

5月29日，我校党委副书记文君同志率校友办主任张惠文一行到广州寻访校友，会见了我校校友、广东省外办主任傅朗，并于同日举行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广州校友联谊会。文君副书记在会上介绍了学校近几年的改革发展情况，同时殷切希望广州校友今后能够多加强与母校的联系，关心并支持母校的

发展。文君书记推心置腹的谈话使校友们感到了母校的亲切，母校的发展让他们深受感动和鼓舞。随后，校友办张惠文主任作了发言，她向在粤校友介绍了近几年北外校友办的工作情况，热烈地欢迎在粤校友常回北外看看，殷切地希望他们能为北外的建设和发展出力。

6月31号，张惠文主任一行又赴海口看望当地



校友。1988年时，北外应海南省政府商请在海南筹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南分院，当年就招生并组织了教学。多年来，学校一直牵挂着这批校友，这次学校特地派人来看望使海南校友倍受鼓舞。他们为母校的发展所欣喜，为母校的关怀所感动，纷纷表示作为北外校友，他们将会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母校的发展，为学校的建设献计献策。

走过天南海北，时光荏苒，不变的是北外人心中对母校深深的依恋和牵挂。在海口，在广州，校友们欢聚一堂，畅谈着当年的趣事，诉说着多年来的起起伏伏；在此时，或明天，北外的学子将与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们，共同创造和见证母校美丽的明天。

我校举行2011届毕业生校友事务理事聘任仪式暨第一次理事会

为加强学校校友工作，疏通毕业生离校后与母



校联系的渠道，促进校友与学校的联络、互动，6月22日下午，2011届毕业生校友事务理事聘任仪式暨第一次理事会在办公楼504召开。校友办主任张惠文，学生处副处长孙眉，团委书记陈洪兵，以及四十余位2011届毕业生校友事务理事参加了此次会议。

校友办于2008年启动了选聘校友事务理事工作，至今已聘任了四届。每届都由各院系党总支推荐。在学生毕业前建立以年级校友事务理事为桥梁的互动机制，加强毕业生间以及毕业生与学校间的沟通联系，并以聘任校友事务理事为开端，推进毕业生“感动·感激·感悟”教育，增进毕业生对母校的感情。自开展校友事务理事的聘任工作后，更好地加强了毕业生之间以及毕业生与学校间的联系，校友事务理事作为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沟通的桥梁，对于联络校友之间的感情、促进学校校友工作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陈健来我校讲学

7月18日，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我校校友陈健来校讲学。

陈健先生以“联合国及其秘书处”为主题，从联合国机构、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秘书处三个部分出发向参加“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培

养模式项目”夏令营的同学们讲解了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及其附属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联合国的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并就同学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通过陈健先生的讲解，同学们对联合国的机构设置、工作体系、运作机制等情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对国际组织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有了更加具体和直观的感受。

讲座开始之前，陈雨露校长在办公楼会见了陈健先生一行。陈校长向陈健先生介绍了学校近年来的发展以及本次夏令营的相关情况。陈健先生对学校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远见表示赞赏，对学校成功申报的三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重点项目表示祝贺，期望学校能够为国家发展输送更多人才。

曹文泽副书记、副校长带队拜望我校校友刘玉堤中将

8月17日上午，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曹文泽率校庆办副主任魏春友，校庆庆典大会组组长苏大鹏，俄语学院副院长何芳拜望了我校1943年在延安办学时期俄文学校校友、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中将。

刘玉堤中将，1923年农历9月17日生于河北省沧县。1938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一二零师旅侦查参谋，参加过百团大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期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中队中队长、飞行大队大队长、师射击主任，先后击落敌机6架，击伤两架，立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1953年后，历任空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军区空军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曾任中共十一大代表，第三、四、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曹文泽副书记、副校长转达了杨学义书记、陈雨露校长的问候，并介绍了我校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我校近年来在深化外语教育教学改革、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刘玉堤中将介绍



了延安时期他在俄文学校学习的有关情况。

曹文泽副书记、副校长代表学校邀请刘玉堤中将校庆日当天回母校参加校庆庆典活动，刘玉堤中将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注册成立校友会 北外校友众望所归

我校校友会的成立工作正在紧张进行。2010年下半年，校友办积极准备申请材料，上报主管机关教育部。2011年5月30日，教育部发函，同意筹备成立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会。现各方面材料均已完备，所有材料均已上报民政部，等待上级部门正式批准注册。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〇一一年本科招生情况

我校2011年本科招生工作已经完成,本年度计划招生1216人,实际录取1169人,其中保送生196人,统招提前批次485人,统招一批次403人,高水平运动员(游泳)5人,内地新疆、西藏班33人,少数民族预科生31人,港澳台6人、新疆协作计划9人。

根据学校的学科特点,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我校高考录取采取了提前批次、高考统招第一批次、保送生等几个录取机制。高考统招第一批次今年共有13个专业招生,总计录取406人,其中男生72人,占16.01%,女生334人,占83.99%;城镇333人,农村73人。

今年我校在全国31个省市录取平均分数线超重点线以上70分,其中9个省市超出100分以上。一志愿录取率前三名分别为英语89.36%,翻译79.17%,金融66.67%。31个省市录取平均分数线超重点线以上65分,其中7个省市超出100分以上。

2011年我校18个专业招收保送生203人,占全校本科招生总数的17%,招收保送生是该校招生工作的特色,为确保保送生招生工作公开公正,在总结以往保送生考试和录取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保送生的选拔方式。今年多次对保送生考试命题全方位进行研讨,更加注重选拔目的与题目的切合度,并调整了口试面试形式。除口试外另加设面试,并将口面试成绩计入总分,占总成绩的20%。对口面试和笔试成绩分别划定合格线,两者都达到合格线的,计入总分排队,由高到低录取。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划,按比例分别录取男女生,男女生比例约为1:3。

2011年,该校首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游泳项目),共有32名考生参加专业测试,签约7人,高考后实际录取5人。

2011年该校京外地区小语种继续列入高考提前批次并按科类按男女分别公布录取计划。一志愿录取率前三名分别为,法语89.4%,西班牙语84.6%,德语83%。

北京地区的小语种提前招生继续实行考生自愿报名,并由该校进行口试、面试,所有报名考生都可参加小语种录取。录取时,综合考虑高考成绩和口、面试成绩。今年报名人数1100人,共录取101人。

2011年该校招生工作圆满完成,今后还要加强招生宣传力度对该校办学特色进行重点宣传,以该校的学科特点、人才培养为核心,制定有利于该校人才选拔和教学人才培养的新办法,吸引更多优秀生源报考。



寻章摘句穷一生，词译经典传后人

——访高厚堃教授



我常想，一生潜心于学术，无意功名利禄而远离社会纷繁复杂的人，大抵比较长寿。临访高厚堃教授之前，我与他有过几次电话通话。已入耄耋之年的他声音清脆而洪亮，思路清晰，思维敏捷，着实让我大为震惊。

约好下午三点见面。当我爬上五楼到高厚堃教授的家时，已是气喘吁吁。我不解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坚持住这么高的楼层。他说：“我就是喜欢安静，我不怕高。从八四年到现在，一直住在这里，没动过。”一边说着，一边把我领进屋。屋内陈设简陋，除了一台电视机，一个茶几和几张沙发，其余全是书柜。

一

见到高厚堃教授本人，才发现岁月已然在他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他步履缓慢，形容消瘦，唯有那双灵动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

坐定后，我问他最近这些年都怎么打发时间。他淡淡地说，离休后，也没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平常就是看看书，听听音乐，做做运动，有时候给杂志社写写稿子。他告诉我，他的很多器官都大不如以前了，眼睛也退化了，看东西写东西都很吃力。唯有耳朵，到现在为止都还可以。因为他习惯了每天听音乐，听英语。

他自从参与编纂新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以下简称

《汉典》），之后又穷十年之力对其进行了修订。《汉英词典（修订版）》（以下简称《汉修》）于1995年问世。其间，他还随从王佐良先生等其他三位教授合编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欧洲文化入门》。2004年开始，他给《英语沙龙》杂志开辟了一个栏目，叫“寻章摘句”。

我问他平常一般做什么运动。说到运动，他一下子来了精神：“太极拳我会，八段锦我也会——八段锦你知道吗？就是古代传下来的一种健身操。我现在只能做这个了。我乒乓球打得可以，人家管我叫高师傅。现在身体不行了，打不了了。”

随即，他翻开一本书，指着一张照片。“瞧，这个就是我。看不出来吧，当时是四六年，我们学校（圣约翰大学）是上海市乒乓球比赛的冠军。”然后，又给我看了几张其他的照片，“这些照片其实连我自己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怎么弄到的。现在偶尔拿出来翻翻，觉得挺有意思。”

这是一本《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史》。我很好奇，便拿过来翻了翻。上面有很多其他知名校友的照片以及生平事迹，包括周有光、林语堂、荣毅仁、邹韬奋和经叔平先生，等等。

二

高厚埜教授于1925年出生于上海，194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毕业后，他当过中学教师，也曾在一家进出口公司任职，上海解放后毅然决定北上。“在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家里人也都很惊讶，但最终还是支持我的决定。虽然一直默默无闻，但这个决定确实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他告诉我，算下来他到北外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刚来那会儿在革大（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睡地铺，吃高粱米，小米饭，干苦力活儿。“后来累得吐血了，革大让我退学，怎么说我都不肯，后来他们也感动了，就把我留下了。”他无奈地笑了笑。

他说，人生有时候真的很神奇，他相信命运。他最初被分配到外交部，但也是由于身体不好，没有去成。他觉得很庆幸，不然《汉典》的诞生也许就仅仅是其他人的故事了：“我觉得我就应该做这个工作，这个才是我喜欢的。尽管很少有人知道我，我觉得无所谓。不知道就不知道嘛，只要我过得满足，过得开心就行。人能够享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如果一个工作你根本不感兴趣，有什么意思呢？当然，有人知道我，我也很高兴。”

的确，除去老一辈的教授和北外早期的学生，知道高厚埜教授的人恐怕不多。我理解他的话。他无意于将自己的成就显耀于人，无意于社会外界对他的看法，但看到有人知道他，记得他，心里总是高兴的。

三

《汉典》的编纂工作始于1971年，历时七年，其时主编是吴景荣先生。后来由于中国社会发展迅猛，汉语词汇更新加快，由危东亚先生担任主编，高厚埜教授和应曼蓉老师作为副主编，根据各方面的反馈以及词典学的理论，于1983年对其进行了全面修订，这次修订工作达十年之久。《汉修》出版后，荣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第二届国家辞书一等奖”和“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汉英词典》的第三

版于2010年1月正式出版。

高厚埜教授告诉我，在《汉典》的编纂过程中，一共制作了数十万张卡片，为词典的立条、释义、例证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例如“大肆”这个常用词，它的依据是上百张卡片，一共有20种不同用法，70多种译法。而且，所有的词条都由北外资深英籍教师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一一审查并最终定稿。“大卫给我们的帮助很大。当时他几乎每天都来上班，工作特别认真，只要有疑问，他都要逐一问清楚。我就陪在他旁边，当解说员。”他笑了笑，说，“还记得有一次在审阅‘汗青’这个词条的时候，有一个例证，是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时他很迷惑，但当我解释了这个历史典故后，他恍然大悟，随即即将译稿定为 Everyone must die, \Let me but leave a loyal heart shining in the pages of history. ”

我连连点头，《汉典》的专业、细致和全面，我们有目共睹。著名科学家谭其骧先生曾说，工具书的质量，是一国文化水平和科学研究成就最明显的体现。此话用于《汉典》实不为过。

我说我曾听一位语言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编词典是艰苦而又不被人理解的劳动，它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

他报以淡然一笑：“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我乐在其中。”

他说，命运又一次眷顾了他，因为他从小就爱查字典：“我小时候没事就翻字典看。一本普通的中文字典，哪个部首在哪一页，我都记得。看来我天生就是编词典的（料）嘛，哈哈！”

我想，编纂词典过程中的甘苦，也许只有参与工作者本身才有深刻的体会。而且词典需要不断地修订，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活的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会一成不变。无怪乎我国语法大师吕叔湘先生曾赞扬词典工作是不朽的事业。

人类编写词典的历史很长，但对于编纂词典的原则与方法——词典学的研究却大约是1925年以后的事情了。想来，编写词典的过程无异于摸着石头过河了。《简明牛津当代英语词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以下简称《简明牛津》）的编者H. W. Fowler也承认在着手编写第一版时，投身于词典学的海洋而未曾学过游泳，更多的是依靠大量的语言材料。



高厚堃教授从开始参与词典的编纂工作后，一直研究词典学和词汇学。他曾经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著文，分别对《汉典》和《汉修》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并指出两部词典的优劣之处。

他认为，编词典的工作最主要的还是立条，释义和例证三大块，而这些都是有讲究的，有它的一套科学方法，并不是随随便便把词语堆上去就可以了。他在《关于〈汉英词典〉（1978）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在立条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处理单字条目时要注意区别对待自由语素（free morpheme）和粘着语素（bound morpheme）；二是多字条目立条的标准。我们认为，汉英双语词典的多字条目应以固定词组（包括习语、四字成语）和“限制程度”较高的词组为主，包括“离合词”，如“结婚”、“开会”、“打仗”以及常见搭配“吃官司”、“开玩笑”等。如果一个词组除了作为语义单位（semantic unit）以外尚有因其组合的形式而别有他解时，那么应以语义单位立条释义，并附以确切的例证。《汉典》多处自由词组或“语法的词”立条，如“沉舟”、“满脑子”、“拉出去”等等，这是有损于词典的严谨性的。

另外，《汉典》里有的词组既立条又在别处作例证的现象不少，英译也不一致。“这是大忌。”他神情开始变得严肃

起来，“词典是最讲究节省篇幅，不能浪费。我的这点想法其实是受《简明牛津》的启发。以它最初所收的let sleeping dogs lie为例。这个习语出现在dog, lie, sleep 三处，而且释义各不相同，直至第六版才给予纠正。”《汉修》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根据语言的发展变化增加了两万多个新的条目。

关于例证，他在《关于〈汉英词典〉（修订版）的修订》一文中指出，例证的主要目的是说明词条在自然场合下的用法，举例不当就会歪曲词义。如“开朗”一词，作open and clear释义时，就不能举例并另外立条为“豁然开朗：suddenly see the light”，而应当举自然的例证，如《桃花源记》里的“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他说，编词典的过程对他影响很大，让他养成了“抠”字的习惯，加上他天生就认真执着，对语言也异常敏感，常常会弄得人啼笑皆非。我说，我有所耳闻。他曾经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有人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发言里exceptional一词翻译成“无与伦比”而心有不安，认为应该翻译成“非常出色”，后来还特地给有关单位打了个研讨电话。

他大笑，说确有其事，还解释道：“exceptional一词的英文释义是unusually good，而不是incomparable，不信你查查？”

他说，没办法，这股劲头他天生就有。

四

高厚堃教授是喜欢安静的。他的喜欢安静，我以为，并非完全源自内心的孤独，而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事业和生活的专注，是对人生的别一种享受。

他热爱音乐。他说，音乐是他一生的爱好。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躲在家中偷偷听古典音乐。他现在每天下午4：40都会定时打开CCTV音乐台，听听音乐。“我读大学的时候，修过一门音乐课，两个学分。当时教我的是一个犹太教授。他用英文讲古典音乐，告诉我们什么叫sonata（奏鸣曲），sonata form（奏鸣曲式），什么叫巴洛克，古典乐派等等。另外，我有一个好朋友，是校内音乐协会的主席。受他们的影响，我懂一点音乐。”说着，他指了指我对面的一个书架，“我收藏的CD很多，你看对面那个书架上，一共四层都是。另外两个房间里面也放了很多CD。”

我知道，音乐是他的得意之笔。他后来除了在学校教联合国译训班，还给学生开过关于古典学派的讲座。北外的校歌《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就是由他后来改编成合唱的。

他告诉我，他曾经学过小提琴和钢琴，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了。他随即拿出一张纸，写了一首七言小诗。他说，他喜欢文学，平常闲来没事就弄弄文字。这几句诗是他在耄耋之年对自己人生的一个小结，或得意，或遗憾：

经世济民随疾风，
寻章摘句老雕虫，

小球弃我圆盘在，
声咽怀娥入梦中。

他告诉我，“寻章摘句老雕虫”是借用唐朝诗人李贺的诗句，而“怀娥”是小提琴violin旧时的中译文“怀娥铃”的省略。看得出，他对“怀娥铃”始终不能忘怀。

他说，音乐带给他一种人生态度。我问他：“所以您才这么乐观这么开朗的么？”他摇摇头说，那倒不尽然。音乐让他懂得享受生活，因为人生往往是充满矛盾的，但音乐可以帮他解脱。“我过得很满足，因为我热爱我做的事情。现在的社会很浮躁，你还年轻，什么时候都要记得想着自己的学问，自己的前途，自己的事业，不要为了金钱的缘故，什么都干。”他语重心长，“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放在心上，对你的人生很重要。我发现你有一定的语言天赋，所以不要浪费。要坚持听英语学英语。现在的学习环境也比以前好，CCTV啊BBC啊CNN啊等等各种英语渠道都有，一定要把握好。以后找工作了，也要注意选择。有的工作有钱但是没多大意思。要我说，吃点苦又算什么呢，我还有我的前途，我还有我的人生，我的前途比什么都重要，我的一生比什么都重要，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五

我回到刚刚那个话题，问他当时是怎么想到在《英语学习》杂志上刊登英文歌曲的。他听后觉得很惊讶，也很兴奋，好奇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他的事情。

他再次起身，从另一个房间里拖出一个装满书的纸盒，步履蹒跚。我赶忙迎上去帮忙。他小心翼翼地拿出几本杂志。我一看，是几期《英语学习》（他是1990—1995年间的主编）。有的封底印有手抄的英文歌曲，字体很干净很有美感。“你看，这些都是我抄的。”他指着那些歌曲，“这是编委们建议的。因为他们知道我懂点音乐。你知道，那时候既懂简谱又懂五线谱的人不多。”

他又翻出几本给我看：“你看这个，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还年轻》）。我很喜欢这首歌。”

这是著名电影《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的主题曲。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奥地利作曲家——“圆舞曲之王”约翰·斯特劳斯的爱情与音乐传奇，再现了一系列圆舞曲的创作过程，其中包括《蓝色多瑙河》（The Blue Danube），《春之声》（Voices of Spring）等举世闻名的曲目。

没等我接上手，他就又把手缩回去，开始照着歌词唱起来，一边唱还一边用脚打着拍子。他神采飞扬，已然沉醉其中。或许是下午谈话太久的缘故，他的嗓音略显沙哑。

我陶醉了，仿佛面前唱着歌的是别一个年轻的他。

不知不觉中，他便接连唱了三四首。后来他实在是累了，便歉意地笑了笑：“哎，老了，嗓子不行了。”

我说，其实我很想继续听下去。他大笑。

树人之德行 立师之典范

——访亚非学院马来语专业吴宗玉教授

艾鹏 邱梓力



伴随着下午温和的阳光，我们在中国马来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马来语专业的吴宗玉教授。一个半小时的长谈，让我们感到：坐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位资深的教授、渊博的学者，更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北外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吴教授向我们娓娓道来，个中酸甜苦辣全都浓缩在这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我们受到的不只是震撼，更多的是启迪。

谈起当年刚来北外教学时的情况，吴教授感叹一句：凡事事在人为。当年吴教授从北大印尼语专业后分配来到北外，只是因为一腔回报祖国热情以及一份未能兑现的承诺。当时，外

交部决定在北外开设马来语专业，于是请当时北大印尼语专业刚毕业的吴宗玉教授来北外开设马来语专业。并且许诺会有马来专家，会购买马来语的相关教材。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吴教授来到北外之后却发现事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1962年，当16位学生已经坐在教室里等待上课的时候，没有马来专家，也没有马来语教材。而吴宗玉教授也只才跟着当时在中国工作的马来西亚播音员学习了很短时间的马来语。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吴教授说：“怎么办？也是因为当时年轻气盛，就硬着头顶上去了。可是当时任教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又怎么能让学生们信

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吴宗玉教授一边教，一边学，搜集各种能搜集到的马来语的学习材料，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和休息时间来学习马来语。而对于教材方面的难题，吴教授参照许国璋英语上面的发音位置图努力摸索，研究马来语的元音、辅音的发音位置，以及清音浊音的区别，最后终于编出了中国第一套马来语教材。就是这样，在吴教授兢兢业业的工作和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下，北外马来语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如今实力较为雄厚的专业。谈及往昔，吴教授的眼中总是有着难掩的光芒，他说：“我当时住在二号楼，楼上全是年轻的教员。那时大家虽然物质条件

上很缺乏，可是精神上却不萎靡，这是最重要的。大家白天教学晚上备课，有时到深夜了，整栋楼都还是灯火通明，大家都在忙着备课、学习。现在条件都好了，网络时代，信息那么通畅，出国也不像我们当年那样困难。可是当年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不能少的！”

对于七十年来北外培养人才的理念，吴教授说：“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师生的关系需要改变，人才观也需要变化。”吴教授道出了自己的观点：“成功不成功不在于用不用专业就业，而在于能不能对社会做出贡献，能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吴教授还向我们展示了他五十年教学生涯中一些极具意义的照片与视频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关于吴老师组织学生送牛奶的事情，对于这件事的目的，吴教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培养创新性的人才，不能保守。其次我们要鼓励学生的创业精神，培养他们的外语能力、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大学培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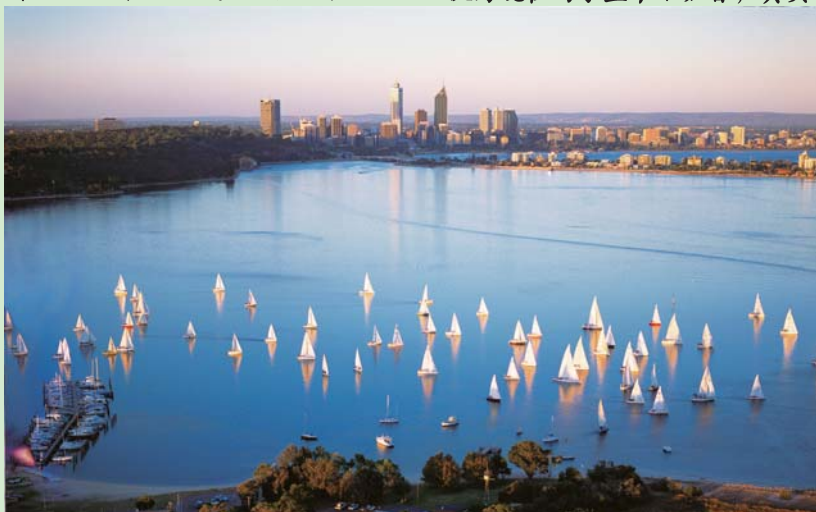
才的目的不是以应用为目的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要对他们进行实践锻炼，让他们敢于创业的原因。”其实吴宗玉教授在培养学生的实业能力与创新能力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还不仅仅只是这些。1996年，吴教授组织了马来语国际研讨会，邀请了13个国家的200多名学者，而这些学者的接待、行程安排、陪同、旅游等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吴教授都交给了当时马来语班的20多名同学去做，在这其中学生受到的锻炼和提高是他们在平时的课堂学习中所得不到的。同时吴宗玉教授还安排学生们接待旅游团，提高他们处理各种紧急状况的能力。吴教授鼓励非通用语的学生“专业水平要高，视野更要开阔”，除了学好语言、翻译、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外，还要以语言为工具加强对对象国的研究。小语种能办大外交。学生要学会用所学语言同对象国进行交流与沟通。要发展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

吴宗玉教授谈到：“许多人认为现在的学生今不如昔，其实

不然。青年人所特有的那种朝气与活力是不变的，虽然说外在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好的传统是要一直继承下去的，比如勤奋、纪律、刻苦等。学生培养不好的责任并不在学生自身，学校的作用就是塑造人，就是激发青年人内在的激情与活力。”吴教授还特别提到：“我认为老师不应该是教书匠，而应该是教育家。”在五十年教学生涯中吴教授身体力行地做到了这一点。

最后，吴宗玉教授告诫北外学子：“对于非通用语学生来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能丢。”

采访结束了，可是对于我来说，心中的感慨激动却久久不能平复。今年正值北外七十年华诞，在这七十年里北外走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曲折坎坷，同时取得了无数的辉煌与成绩，铸造了“外交官的摇篮”与“中国外语教学最高学府”的金字招牌。而这样辉煌成绩的取得，背后是像吴宗玉教授这样一批又一批俯为人师甘为人梯的优秀教师的不懈努力与拼搏。今年又是亚非学院成立五十周年，也是吴宗玉教授在北外教书的第五十个年头，马来语的从无到有再到发展壮大都是吴教授点滴心血的积累。我们也庆幸能有这样的老师伴我们成长，指引我们前行。在校庆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也代表北外学生向老师们由衷地道一句：感谢吾师。



往事，难忘的往事

——纪念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 70 周年

姚培生

作者简介：

姚培生，1972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曾任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曾先后任驻吉尔吉斯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克兰大使。

“世界上凡有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就有北外校友的身影。”——我一直记着这句名言。我在北外学的是俄语，而 1941 年成立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的俄文大队正是母校的前身。因此，作为北外校友，我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在母校的八年多时光，令我终身难忘。是母校为我打了基础，送我走上了外交舞台，成为一名高级外交官。

上海世博会上的一件事

自 1995 年初至 2005 年底，我先后出任驻吉尔吉斯、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 4 国大使。在近 11 年中，我结交了众多境外朋友，多次接待过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为促进我国与驻在国的双边关系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工作过的地方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也给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政要和学者等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去年我被任命为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副代表，主持外国代表团的馆日活动和迎送参会外宾。当乌克兰代表团事先获悉我将主持他们国家馆日活动的信息后，代表团团长请求将与我会见的时间延长半小时，理由是：我曾在那里当过大使，希望见到老朋友时多说几句。据世博会礼宾组同志讲，这样的要求还没碰到过。为满足乌方的要求，礼宾组为此破例作了调整。也正值世博会期间，乌克兰新当选总统亚努科维奇访问上海并参观了世



博园。临别时，他满怀深情地对我说：“大使先生，见到你我感到格外亲切，我此生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之间建立的诚挚友谊，那是段十分美好的时光，我希望你有机会再次来乌克兰！”原来，在 2004 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我间接、直接地向他表示了同情或支持。在选举最白热化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预祝他竞选成功。虽然因内外因素他最终受挫，但我的所作所为显然给了他强烈的印象。我从乌克兰离任时，前总统库奇马与我进行了长谈，并赠给我一部他自己的大作《乌克兰不是俄罗斯》，并在扉页上写下了如下一段话：“大使阁下，您无愧地代表了伟大而古老的文明和今天的伟大中国。我坚信，我们两国人民的关系定有美好的未来。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双方在漫长的征程中已迈出了头几步！”2003 年秋，我向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辞行时，他授予我一枚金质奖章——共和国友谊勋章。纳说：“你为发展哈中两国关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你应当得到这样的荣誉！”时任哈外交部长的托卡耶夫对我说，这种勋章不是随便颁发

的，哈建国13年来一般只授予本国人士，外国大使获得此荣的寥寥无几。

我列举上面几个例子绝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只是想说明，大使的岗位是崇高而光荣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驻在国领导对大使的赞誉并不完全对他个人。在那个岗位上，我不是具体的我，我代表着我身后的伟大祖国和人民。因此，每当向驻在国国家元首递交国书宣读颂词时，我内心会自然升起特别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外交都从小事做起

有人曾问我：“你一到外交部，是否就有当大使的蓝图？”我笑着回答：“不要说蓝图，连想都不敢想，但当大使秘书的想法早已有之！”其实，人生之路，不在于你表面多么辉煌，而在于你做的每一件事，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在3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我始终恪守一条：不浪费每一天时间，不马虎每一件小事。人的才干、知识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我1973年5月第一次去驻苏联使馆工作，先在办公室干了好几年杂务，买票、接货、购物样样都干。接待过路代表团不知其数，陪同国内来客参观列宁墓不知多少次。可以说，我是见过列宁墓次数最多的人。当时由于办公室人员少，工作量大，早出晚归，赶不上吃饭，在外边啃点面包喝点水是常事，久而久之我的胃功能受到了损害，食欲不断减退，睡眠越来越差，不得不靠安眠药。1977年底，我还突然遇上了一件“伤心”事：一头黑发在一个月內几乎掉光，只剩下了微不足道的一些稀毛。这令使馆很多同事惊讶。无奈，我叫理发师给我干脆剃了个精光。才三十多一点的我一下变成了另一幅模样，不难想象我当时的复杂心情。一个路过莫斯科的大夫给我进行了会诊，他认为主要原因是莫斯科光照不足，蔬菜水果摄入量少，加上精神过分紧张，作息不正常，都会导致这种急性脱发。他建议我调整作息時間，并介绍了治疗办法。我当时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也想

换个体力消耗少些的工作，或者换个单位，或者离馆回国。但经过反复思考，我没有向领导提出任何要求，而是出门戴着帽子继续做原来的工作，直至1977年调到研究室工作。

到研究室后，我先做大事记，整理基本资料，再一步步学写调研报告。在研究室，每天翻报纸、读杂志、看电视看似很轻松，但实际不然。一是难了解到实情。当时的苏联是封闭国家，公开渠道透露的信息量很少很少。与当地的人基本没有接触，更不可能获得货真价实的东西。二是怕犯政治错误。因为当时中苏国家关系对立，研究成果中提出的看法观点往往跟风跑，不实事求是。我记得，1973年部里曾有人写过一篇关于苏美关系的看法，被上级批之为“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作者检讨了很多次。从此研究人员头上被无形套上了紧箍咒，写报告时总要左顾右盼，穿靴戴帽，直到认为找不到“茬子”。因此文革中调研是真正的“绞尽脑汁，搜断枯肠”。文革结束后，许多框框被打掉了，外交部领导要求调研也必须实事求是，不要跟风。但任务也是不断加码。1987年我第二次去使馆研究室工作时，正巧赶上苏联戈尔巴乔夫大搞“民主化”时期。由于苏联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地区乃至世界格局变化的问题，因此，我中央领导一开始就给予高度关注，不断要求使馆提供分析报告和基本看法。研究室政治组的每个同志心理压力很大很大。我



从早到晚在办公室里看报分析，本子记了一本又一本。为了及时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不得不经常工作到半夜，甚至凌晨。我记得，1990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准备放弃执政党地位，实行所谓的“三权分立”制，此事引起我国最高层的严密关注。为了使我中央领导以最快的速度得到第一手材料，研究室同志为此不休息连续工作了两昼夜。所有信息资料硬是用手抄写后直接发往国内。会后研究室同志疲惫不堪，两天都没缓过神来。所以说，在外交战线上没有省心活。即使宴会上招待会上举杯碰杯，那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外交是崇高的职业，同时也是苦差。操心事、麻烦事远多于爽心事、快乐事。有一年我来母校招生时对学生说，“不怕苦的你来外交部，怕苦的你走其他路！”

外交工作不是开汽车，一两天可以学会。它是一门永无止境的高深艺术。在十多年的大使岗位上，越深入工作，越觉得自己知识不够。因为对外交官而言，没有多余的知识。肚子里没货，别人就瞧不起你。所以我一向不爱麻将纸牌，而是利用一切时间阅读各个学科的书籍来补充“养料”。除了政治、经济、外交、历史类，其它音乐、艺术、自然科学等等也多少有所涉猎。我记得在乌克兰时，乌科学院院长会见我时介绍航天技术，希望与我有关科研单位继续合作。我一听就明白，不需他作过多解说。因为航天技术类的书恰是我喜爱的业余读物。连理论物理学中的主要问题，我也搜集。比如宇称不守恒定律用俄语怎么表达，我曾剪成报纸放在自己的资料夹里，想不到在央视做俄语新闻时派上了用场。

我主持过苏联解体后的首次边界谈判

我在外交部有13年时间专门从事边界问题。苏联解体前是中苏边界问题。解体后是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问题。现在中国与上述四国的边界问题都已彻底解决，其意义极为深远。

我是上述过程的参与者之一，自然不会忘记谈判场上场外的事。1979年我从使馆调回部里后被分到中苏谈判代表团，一连工作了8年。刚到这单位时，团领导给我的任务是熟悉所有边界条约文件并要我届时接受测验。从此我开始背诵那些极为枯燥的条约文本，并翻阅档案文献，做了大量笔记。约一年后，老专家让我背诵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条款，我顺利通过了测试。1983年夏，我随总参同志对中苏西段3千公里边界进行了考察，从中蒙苏三国交界点一直行进到中国、巴基斯坦边境口岸红其拉甫，历时50多天。期间我爬上4千米的高山与苏联边防军擦肩而过，在悬崖峭壁上与我边防战士骑马巡逻，与山洪泥石流搏斗过，我们还看望了在严重缺氧条件下守卫祖国西大门的边防战士。我对部里同志说，体验过他们的艰苦，其它困难都不在话下了。1985年夏，部里又派我与黑龙江外办同志考察中苏边界东段水界，从漠河坐船一直到兴凯湖，对黑龙江乌苏里江中的大小争议岛屿包括黑瞎子岛进行了详细登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高度评价了我们的工作成果。我两次考察边界历时100多天，外交部里还没有第二人如我有幸得此机会。

看了边界实地，参加边界谈判的感觉与别人是不一样的。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中方与俄哈吉塔四方商定继续谈判边界问题，并确定了“一对四”的工作机制：即中国为一方，对方四国联合组团为一方，亦称联方。1993年2月，我受命率中方工作组前往莫斯科与联方代表团举行了苏联解体后的第一次边界谈判。因对方是四国官员组成，人数自然比中方多的多，俄方出任团长。哈、吉、塔派出的外交部高官，分坐在俄方代表两旁。我在非正式场合对俄方一官员开玩笑说：“你看，四对一是‘不平等’的谈判啊！”那位官员恰说：“感到‘不平等’的应是我们，四方加在一起才顶你一方呢！”那次会虽没有讨论具体的边界线走向，但共同确认苏联解体前中苏

达成的协议继续有效，并就今后的工作程序和方法达成了共识，会议气氛较好，似乎没有发生过苏联解体这件大事。在以后的几次工作组会议上我与“联方”开始按国别讨论边界线走向。涉及到哪个国家的边界，就由哪个国家代表发言并提出具体划界主张，其它国家代表一般也在场听会。“一对四”的谈判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磨合一直工作到我与四国边界问题的全部解决。

边界问题涉及国家的重大利益和民族的尊严，绝对不像做买卖那么简单爽快。每方都很谨慎耐心，反复研究对方提出的方案。在工作组会议上，一方提出具体方案的发言有时只有几分钟，对方听后提出休息，表示要“认真研究”。这一研究或一小时或两三个小时，或拿不出对案，只声称“带回去研究”。这是常事。一方往往能容忍对方长时间的研究。在边界谈判中，“研究”两字使用频率很高。不过“研究”两字在不同场合确有不同理解。中苏对抗时，谈判也是战场，“研究”两字基本不用，更多使用的是“抗议”、“反对”、“拒绝”、“不同意”等词，将对方建议顶回去。我发现苏联的老谈判手听到“研究”两字时很重视，惯于反复琢磨。他们认为，“研究”两字含义深刻，有时暗示可能接受对方提案或建议，有时碍于面子不愿使对方尴尬，用“研究”作挡箭牌。这就需要作“研究”，以判定对方的真正意图。现任哈萨克斯坦议会领导人的托卡耶夫就是一个重视“研究”的资深外交官，他精通汉语，参加过中苏间的很多谈判。他在一本专著中对“研究”两字作了解析，可谓对“研究”研究到家了。

有意思的是，谈判中双方经过长时间磨合，在阐述原则立场表明基本观点时还往往会说相似的话，唱相似的调。记得有一次在外地参观后，我与对方组长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商量会议总结问题。我已写了个提纲，并向他罗列了要点。他也自己写了个提纲，并罗列了要点，发现与我的总结几乎一致。“英雄所见略同，你的总结性发言



我不要再研究了！”——我这样对他说。研究边界问题和参加边界谈判是我外交生涯的重要部分，对我后来担任使馆领导工作大有助益。

学习俄语从“P”音开始

人生来去匆匆，我早已年过花甲，因而现在常常回忆往事，回忆中学母校、大学母校

一用到俄语，总会想起中学时代的第一课。1958年9月，我在老家小学毕业后考入镇上的初中学习。那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初中一年级4个班中2个学英语，2个首次开设俄语。我被分在俄语班。我在农村出生，是地道的土孩子，第一次接触外语觉得很新鲜。教我第一堂俄语课的老师是南京大学毕业生。他说俄语里的卷舌音“P”你们得学会，不会发这个音，苏联人听了会感到别扭。他一连读了10来个带“P”音的单词，引得我们哄堂大笑。从此，我们开始像学鸟叫那样“嘟噜噜”地练个不停。我很快学会了，一年下来多数学生也学会了，少数学生到高中毕业也没学会。但老师没有强迫每个人都要学会，还告诉我们，革命导师列宁也不会发这个音。这令我吃惊。

我在中学俄语学得较好，老师总夸我，越夸我就越来劲。到高二、高三时，学习已无多大难度，考试总在前三名。高中毕业时我甚至可以为一一些学得吃力的同学

作点辅导。但1964年报考北外时，心里其实没有底，不过是想碰一碰运气。后来得知，我俄语得了最高分。

在我任大使期间，家乡的一份报纸以《农家走出驻外大使》为标题，报道了我在中学的故事，夸我“聪明伶俐”。这实在是夸过了头。但说我刻苦始终、勤学不辍，倒是事实。我老家虽离上海不远，但1964年之前连电都没有通上。在小学时期，我用灯草灯，中学时期才用了煤油灯。家庭作业都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完成的。在盛夏的傍晚，无数的蚊子飞虫向你扑来，我不得不一手拿着蒲扇使劲驱蚊，一手拿着笔争分夺秒做作业。为阻止蚊虫叮咬，我甚至用“六六六”农药粉直接涂在胳膊和大腿上。尽管达到了驱蚊目的，但用多了皮肤变成了紫红色并伴有阵阵刺痛。夏天有烦恼，冬天也很难熬。由于南方冬季没有暖气，室内常是零下温度，即使穿着棉袄棉裤棉鞋也觉浑身透凉，手指常常失去知觉做不了作业。但最艰难的是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闹饥荒，大家只能饿着肚子上学。但即使那时，中学母校中也没有一个学生辍学，没有一个老师中途辞职。今天回头看，过去的苦日子，倒成了我人生路上的财富。个人意志得到磨练，性格变得坚强，懂得人应热爱生活，珍惜时光，奋发向上，将来报效祖国。

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老师教我语音语调



1964年9月，我踏进了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学院。从农村一下跳到首都学习外语的最高学府，开始还不大习惯。倒不是学习问题，而是不会说普通话，与北方同学交流出现了障碍。记得在班里第一次召开入校心得座谈会上，我每讲一句话都要想一想怎么发音表述，磕磕巴巴讲话，北方同学忍不住发笑。大概过了半年，我才基本学会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这一关过得也不容易。不过幸运的是，系里为我们班配备了最有经验的俄语老师，其中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老师专门教我们班的口语课。当时我们都知道李立三担任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共领导人，后被撤职。但大家认为，系里安排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夫人教课，说明对我们这个班的重视。我所在班的学生均来自外地，且都是工农家庭出身，因此被称之为工农子弟班。由于我们原来在中学学的俄语发音南腔北调不标准，所以大学一年级一开课就必须纠正。李莎老师对我们特别有耐心，一点也不摆架子。她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想出办法一词一音地加以纠正。可以说我后来能掌握较标准的语音语调，应主要归功于她的努力。我有21年在驻外使馆工作。在与驻在国友人交流时，他们总是夸赞我的语音语调，以为我是留苏学生。在任大使期间，我常在媒体发表讲话、到学校作演讲，体会到好的语音语调可明显拉近我与听众的距离。

从1964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母校的教学是正规有序的。学校对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作了不少改革尝试。我印象较深的是，减少纯文学性文章，尝试增加政治性文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后来成为必读文章。这些文章的译文都经过中苏权威语言专家的反复推敲审定的，语言质量无可挑剔，很多段落老师要求学生背下来。那时整个学校的学习气氛很浓。每天清晨校园里书声朗朗抑扬动听。做早

操时，各个语种的学生都用外语呼口令。我住的宿舍楼里是俄语系、东欧语系、亚非语系的学生，大家在楼前各占一块地方，各呼各的口令，叽哩呱啦，互不相扰，外人看到觉得很有趣。

母校—我永远的记忆

一些校友碰到一起时自然会谈起母校生活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没有人会忘记。一位校友最近问我：“你从母校究竟得到了什么？”我说，除了外语知识，有三种精神一直在我记忆中：

一、可贵的敬业精神。在那个年代，绝大部分老师不计名，不逐利，对教学有高度的责任心，绝不敷衍了事。比如备课，课上一小时，课前准备远超过一小时。上翻译课的老师甚至要花上一两天时间编写教案。那时没有电脑，物质条件根本无法与现在相比，连机械打字机都不够用，大型工具书也不全。我看到我系老师通过长年努力，不辞辛劳，将常用范文、词条、例句做成了一叠叠卡片，并做出详细检索目录。在湖北农村，老师们白天坚持下地劳动，晚上不顾疲劳，还挑灯夜战为学生备课。

二、可敬的宽容精神。在十年文革中，院领导和一些老师遭到严重冲击，教员学生分成了派别，少数学生甚至对老师拳脚相加动用棍棒。但全院复课后，受过伤害的老师没有以恶报恶、以怨报怨对待加害过他们的学生。我记得我系一位老师曾被几个学生蒙上眼睛拖到教室里毒打，惨叫声令人心碎。这个老师当时知道谁打了他。但三年后复课时老师并未另眼待他。在一次翻译课上，他还夸这个学生的译文做得好呢。我当时真的肃然起敬！这个情节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这个老师不是领导，更不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他挨打的“罪名”就是因为参加了另一派群众组织。虽然1971年秋全校复课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但绝大多数老师都能摒弃前怨，消



除派性，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

三、可歌的育人精神。在文革前我始终感到，从学校领导到普通教员，他们始终身体力行，坚持教书育人的方针。我记得1964年刚开学第一周，院教务长就单独约我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高的领导，当时不免有点紧张。他大概说了如下内容，你以江苏省的最高分考到外国语学院很不容易，今后除了学好外语和其它课程，思想要不断提高，政治要不断上进，要做到又红又专。系党总支书记约我谈话时希望我今后政治业务双丰收。当时，学校里很多同学包括我，在文革前都向党支部提出了入党申请。院领导号召师生员工团结互助，艰苦奋斗，学习雷锋精神，争做先进人物。学校还组织各种报告会，邀请参加外事工作的老校友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先进事迹，报告的主线是忠于祖国忠于党。我们高兴的是，尽管经受过文革动乱，但母校仍然坚持几十年优良传统，成为一个真正和谐融洽、不断创新向上的最高外语学府。

往事如诗，诗远行，意无尽。尽管我离开母校已多年，但那段时光永远值得我珍惜追忆！我衷心感谢母校对我的多年培育！祝愿母校为国家造就更多的栋梁之材！

北外——我终生难忘的母校

刘士义

作者简介：

刘士义，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曾任驻瑞士大使馆政务参赞。

我，本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生于忧患，家境贫寒，在辽中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随着五星红旗在中华大地上升起，家乡巨变。我，上了小学，进了中学，升了大学，沿着革命先辈筑就的康庄大道勇往直前。

1961年，我所升入的高等学府，是我报考的第一志愿——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北外”）。大文豪雨果的母语，是我要学习的语言。

1965年，即中法建交后的第二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原因是，外交部选派我到闻名遐迩的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进修法语，以便日后成为新中国外交队伍中的一员。

光阴似箭，转瞬间，我离开北外已数十年。然而，飞逝的光阴并未冲淡我对母校的怀念。每当忆及在母校度过的岁月，那一件件往事和一个个场景，便会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忘不了母校优美的校园

入学报到日期临近，我揣着录取通知书，带着简单的行装，坐着火车，从辽宁省会来到首都。出乎我的意料，北外特地派人派车，为我们新生接站。

到了北外校门前，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那长条型的校牌。白底上刻着的七个黑色大字，刚柔相济，堪称

上乘书法，令我十分喜欢。

不远处，一座大厦，巍峨耸立。大理石为基础，青砖为墙面，蓝色的琉璃瓦构成其顶部和飞檐。我觉得，这座与天地浑然一体的教学楼，仿佛正是我梦中的圣殿。

行至校园，但见同色楼宇，四周围绕；平坦甬道，纵横交错；运动场地，大小不一；松柏杨柳，排列有序；红花绿草，各处点缀。此外，还有一个池塘及其周边一个个的石礅。啊，多么整洁！多么幽静！多么典雅！真可谓别有洞天。

在法语系学生宿舍前，我看到入口处上方悬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红布上贴着“来了就是主人”六个金色大字。我精神为之一振，心想，这是何等温馨而又及时的提示啊！

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很快便融入了这个新的集体。

于是，我成为了这园中“又一棵苗木”，得到了园丁精



心的栽培。

我忘不了母校可敬的老师

我在北外就学期间，施予我恩泽的老师，人数颇多。他们中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有授课的，也有不授课的。

我们那一届法语系新生共约50人，分成三个班。开学后的头两个月为打基础阶段，主要学法语的发音和练习26个法文字母的大写、小写。为使我们掌握正确发音，曾三位女老师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进行训练，有时还加班加点，废寝忘食。我本人就曾“吃过这样的小灶”，直到完全过关。

给我们上法语专业课的，还有分别负责语法、精读、泛读、电化教学等课程的中国老师。而来自法国、比利

时的四位法语专家，则先后为我们上口语课和进行口、笔语的各类考试。他们都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甚至连我在答卷中误用的一个标点符号也未放过。

为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学校设置了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公共课。在大阶梯教室为我们教这些课的老师，经验丰富，学识渊博。此外，还有在室外上的体育课，体育老师教的内容，花样百出，生动活泼。我对所有这些课程，都饶有兴趣，受益良多。

我们年级有位政治辅导员，他对学生关怀备至，为大家排忧解难。比如，当他了解到我每月15元的伙食费难以为继时，为我申办了助学金；当他看到我在严寒风季节穿着过于单薄时，为我申领了一件新棉衣。我感到，一股股暖流传遍了全身，传到了心底。

有个忙碌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学校食堂管理员的身影。在我国经济困难时期，他为了搞好食堂伙食，保障全校师生健康，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我看来，他也是一位值得效仿的好老师。

有个场面，是我始料未及的，那是法语系一些老师为我赴法进修送行的情景。为避免显得张扬和造成惊扰，我未将离京时间告知任何人。没想到，出发的那个晚上，当我们赴法留学生乘坐的大巴车途经北外正门时，突然停了下来，并有人呼喊我的名字，让我下车与老师话别。路灯下，见到这些慈祥的面容，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深深地给他们鞠了一躬，并用他们教我的语言连连致谢。

我忘不了母校可爱的同学

常言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到了北外，见到客观条件这么好，我心里就想：现在就看个人主观怎么努力了；自己一定要按照党的要求，力争做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并且还要与同学团结友爱，共同进步。



决心和意志驱使我像幼犴食草一样，默默地吸收着营养。为相互勉励，我和一些学友互赠自制的书签，上面写着名言或警句，比如“读书吧，这是最好的事情”；“只管耕耘，莫问收获”；“厚积薄发，天道酬勤”……

有一景观，堪称世界罕见，每晚在北外两大自习室里呈现：几百名学生聚在一起，同时高声念外语，而且是几十种外语混合成谁也听不清、辨不明的“外语”。我是那里的“常委”。有时我暗自发笑，“我们北外的莘莘学子，真正做到了心无旁骛，在这一点上，与我国古代特意到闹市里读书的孟子可有一比。”

同两大自习室的情况截然相反，学校灯光明亮的图书馆和微风拂煦时的池塘边，却是一片静悄悄。这两个地方也是我平时看书的好去处。我伴着青春年华，奋力在书山上攀登，尽情在学海中遨游。真是美哉！快哉！其乐无穷！我和学友们共享这幸福时光。

在北外，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每周，我总会留出几个晚饭前的课余时间，与同学们打乒乓球或羽毛球，有时也参加班级之间或年级之间的篮、排球比赛。有时晚自习后，我同几位好友遛达到操场上，边聊天边玩几下单杠、双杠或吊环。我们也曾在夏天里去游泳，在冬天里去滑冰。

我们课余的文娱活动也不少。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我与另两位音乐爱好者凑在一起，组成一个自娱自乐的小乐队，他俩拉胡琴，我吹笛子或吹箫。在法语系及全校规模的晚会上，我曾参加过诗朗诵和口琴合奏等演出。我们班同学还曾一起到香山顶上踏青联欢，歌声和笑声响彻云霄。

我担任法语系学生会生活部长期间，全系开展“五好宿舍”活动。因召开会议和检查卫生等工作上的关系，我与各年级同学均有广泛的接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北外，还有一些与同学相聚的情景令我记忆犹新。比如，我在赴法进修前，很多同学一帮帮、一次次

地围在我身边，有的投来欣羡的目光，有的拉住我的手不放，有的说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类的祝语，还有的送我精致的笔记本，在扉页上写着“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祝辞。

我更忘不了陈毅在北外讲的“那堂课”

陈毅元帅，威名远扬。我到北外之前，对他的丰功伟绩早有所知，并甚为感佩。没想到，我到北外的第三天，便目睹了他的风采，聆听了他的报告。

那是一个天气晴好的上午，北外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听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做报告。整个大操场鸦雀无声，只有他那铿锵有力的四川音在校园中回荡。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将他的话，一句句、一字字，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像他期望的那样，做到政治上坚定，永远忠于祖国；业务上过硬，更好地报效祖国。

在我看来，这既是一个政治报告，更是我上大学后听的第一堂课，一堂震撼心灵的启蒙课，一堂影响我人生道路的教育课。联想到他那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认定，他便是我的人生导师。

沧海桑田，世事难料。当1967年我和其他留法同学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时，我怎么也不敢相



信，他已受到严重冲击。我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我的心在隐隐作痛。

我在外交部看了两个月的大字报，接着便被派到国外工作，但我一直关注着我们外交队伍这位领军者的处境。后来得知，他过早地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土地和人民，当然也包括他麾下的我这个外交新兵。从新闻媒体报道中，我又得知，为他举行的追悼会，规格空前。

面对无端的诬陷和攻击，他在诗作中，曾以青松自喻和自勉。以我之见，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就是一棵狂风吹不倒、大雪压不垮、顶天立地的青松！

具有崇高精神和伟大品格的陈毅元帅，永垂不朽！

我对党和母校的感激与祝愿

我在党的哺育下不断进步，由一个穷孩子，成为了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我怀着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带着掌握的知识和本领，开始了漫长的外交生涯，画出了自己的人生座标和轨迹。

遵从外交部安排，我曾六次到我国驻外国大使馆工作，驰骋在国际外交第一线达二十余载。我所去的法国、马里、比利时、毛里求斯和瑞士，均以法语为官方语言。北外老师传授给我的法语，大有用武之

地。总的自我感觉是，门路对头，学以致用，如鱼得水，胜任愉快。

我也曾在国内外外交部一些地区、业务司工作多年，担任了副处长、处长等职，参与接待过一些外国高访团或随团出访，因而，我所学的法语也都派上了用场。

我的外交生涯，大致可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担任使馆领导翻译为主，同时也做了些宣传、办案、调研等方面的具体工作；后一阶段，被安排到领导岗位，成为了一名高级外交官（使馆政务参赞和临时代办）。在整个工作期间，常有人对我讲的法语大加恭维，我对此均泰然处之，有时应询告称，我曾是北外的学生，并引以为荣。

遵照国家规定，我业已到龄退休，参加了外交部为我们一批离退休老干部举行的隆重仪式，部领导为我们颁发了红绸烫金封面的荣誉证书，并与我们合影留念。在给我的证书上这样写道：“刘士义参赞，您长期在外交战线辛苦工作，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光荣退休，特发此证，以资表彰。”签署证书者为外交部长。

太平盛世，安度晚年。由于我与法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退休了，也还在与法语为伴。闲暇之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朗读“拉封丹寓言选”等法国原文作品；在某些联欢场合，我会应邀唱些原汁原味的法国歌曲。

由于多种原因，我久未去母校造访。然而，令我感动的是，母校没有把我遗忘，给我寄来校庆请柬和名为《校友通讯》的校刊。

知恩图报，饮水思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我心中的歌。同时我也深知，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北外，更不可能有今天的我。我对党和母校的感激之情，说不尽、道不完，只有在这里致以衷心的祝愿。祝愿在党的领导下，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母校与时俱进，硕果满园。



我和北外

裘企阳

作者简介：

1952年12月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第46班，专修俄语，1955年4月9日提前毕业；1999年11月21日从中外合资的中国康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退休。退休后被返聘至2003年2月，任中国康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顾问；2003年2月至2009年4月任中国金融学会金融租赁专业委员会专职高级顾问；2003年4月至今任全国人大财经委《融资租赁法》立法起草小组顾问组顾问；2006年4月至2010年10月任浙江（现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总参通信兵部二站技术翻译，北大荒850军垦农场云山畜牧场奶牛班长，四清工作队员，761、762军工厂技术情报员和司炉工，广电总局计划科调研员，杭州广播电视台厂外事代表，中国康富国际租赁公司审查稽核本部主任兼研究室主任，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等。

我1949年10月考入北京师大附中干部子弟班读高一。我一向重文轻理，记得化学老师曾在课堂上痛心疾首地说，“裘企阳，大学理工科没你！”我听了不但不难过，反而暗自窃喜。太好了！我本来就想搞写作嘛！

当时，该校其它班级学的都是英语，只有干部子弟班例外，学俄语。教我们的老师是定居中国会讲汉语的白俄。没有课本，全靠口授。后来我发现，这样的安排虽属无奈，其实却好处多多。不仅是发音准确和说出来的话符合规定情景。尤其是，彻底

抛弃了学语法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因为，学语言就像学开车学游泳一样，是学技能而不是学知识。只有专门研究某种语言的结构方式的人，才需要懂得甚至精通该语言的语法。另外，我此前学的外语是英语，现在改学俄语，又别扭又好奇，所以特别喜欢俄语课。

临毕业前，一位曾是地委书记级记者的校领导专门找我谈话，讲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正好同我的想搞写作的理想不谋而合。所以，在高考报志愿时，我首选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其次是我饶有兴趣的“俄语”。接到通知书时我看到，录取我的是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怎么回事？虽然这同样对我的胃口，但我还是不大明白，难道我文科考分不够？后来才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1955年才设立的，1952年还没有呢！其次大概是因为，当时特别需要培养俄语人才，而主动报该志愿的则寥寥无几。

本来，开学时间应该是每年的9月初，但是由于位于内城墙西南顶角——鲍家街西端的校舍尚未建成，新生一直要等到1952年12月才可以去报到，而且一开始时同学们的宿舍还借用了位于鲍家街中段北侧前北京女师大的校舍。

入校后，我被编入了该校第46班。我们的老师全都是苏联妇女。后来我才知道，她们全都是来华援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专家顾问的夫人。

由于我高中学的是俄语，所以听课时感到很轻松。不过，虽然我的成绩从未低于5，却总也拿不到5+。问题在于我改不了的臭毛病——粗心大意，在

笔试时总会出现拼写错误标点符号用错之类。正因此，老师给我特别定了规矩：答完了卷子不许交，一直要等到下课铃响，用这段时间认真检查和修改所发现的错误（包括笔误）。这个对我量身定做的规矩不仅使我后来拿5+几乎成为常态。尤其是，培育了我后来从事各类职业（特别是涉及收付金额的金融融资租赁行业）时的十分严谨的习惯（例如，数据计算测算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八位数等等），使我终生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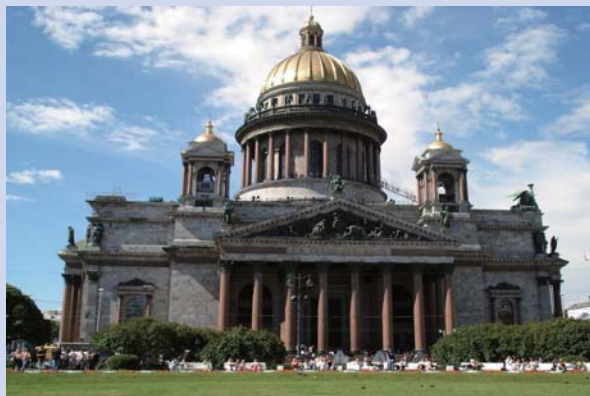
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的笔试是命题作文，有两道选择题，给考生两节课的时间，课间可以在走廊里休息十分钟。那一次我走出教室休息时，我的同班好友丁北海问我写了多少了。我说，“还没选好题目呢，一字未写。”他一听就急了，叫我别休息也别犹豫了，赶紧回考场定题目动笔。结果是，没到响铃时我就写完了，而且成绩不错。

当时，期末考试时口试项目的规则是，全班同学先在考场外走廊里自己报号排序。考场里讲台下面坐着六位或八位考官，当然其中的多数不是本班的老师。面对考官，有三个座位，前面坐的一个考生直接口头回答考官的提问，后面并排坐的两个考生则按黑板上的试题做现场准备。对此，同学们几乎都想排序靠后，以便多留一些最后的复习时间。而我则不然，我是个急性子，又贪玩，所以我总能轻松地拿到第一号。在考场里，面对这么多考官，我的虚荣心会急速膨胀，兴奋不已。想不到的是，越是这样，我的对答反而越好，总能拿到好的成绩。当时我自己也不明白原因何在。后来，在我从事了若干极不相同的行业，以至成为了高工、高级顾问、独立董事和全国人大《融资租赁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之类时才明白，其实，这正是我平时在课堂上聚精会神不断思索的必然结果。真所谓“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呀！

当时的教学方法之一是在课堂里放一台留声机。同学们可以用它听由苏联歌手或合唱队员用俄文演唱的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歌曲。我发现，听歌曲是语言教学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其一，听歌曲让人轻松愉快，绝不会枯燥乏味，因此大家爱听，不会像上课时那样可能走神甚至打盹；其二，发音可以准确；其三，如果你学会了唱某一首歌，那么，其中的平时单独学不容易记住的词语，就因为是嵌在整个句子里面的而很容易地就记住了。正因为如此，我在俄专时先后从外文书店买了苏联列宁格勒国家音乐出版社于1953、1954和1955年出版和按类别分的三册《俄罗斯歌曲》，共有歌曲607首。其中，我会唱的约150首。

我在师大附中时曾是男女附中剧团的成员，同一帮爱玩和会玩的同学玩了三年。也正因此，我入俄专不久就被推举任学生会文体部副部长，赢得了我此生最高级别（副部级）的职位。当时俄专有个特别规定：鉴于来华的苏联专家和夫人都爱跳舞，俄语专业人员也必须会跳舞。因此，每周六晚上所有学生都不得离校，而是去食堂搬开桌椅学跳舞。而且每次都是由校长师哲（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同一位女老师先跳一场作示范。另



外，为了多一些练习的时间，每周有两天各班级都得在下午课后在教室楼下的空地上练舞。管理监督此事的任务，就落在了当时还不会跳交谊舞的我这文体副部长的肩上。

2003年，在我年满69岁，已经退休、在虽然担任某行业协会高级顾问、但无需天天出去开会或讲课的情况下，有朋友向我推荐了北京的一个名为《快乐的风》的老年合唱团。我听了十分高兴，立刻就去报名应试。他们的规矩是让每一位应试者唱一首他们指定的俄罗斯歌曲，然后由他们决定录取谁。巧的是我去得较晚，排在末尾。因此，在唱完指定的歌曲后我居然被允许再唱两首。想不到的是，唱完后我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而且当场决定我被录取。可惜的是，由于行业的事情实在太忙我竟从来未能同《快乐的风》的老年人一道合唱过一次！

说到俄罗斯歌曲还有一处不得不提，那就是位于世纪坛西侧一个地下室的专门提供俄罗斯餐饮的《基辅餐厅》。那里只在晚间营业，客人在吃喝的同时还可以付款点唱俄文歌曲。演唱和伴奏的都是来自基辅身着军服的基辅军队合唱团的功勋演员。他们同中方是长期合作关系。中方提供场地和餐饮，他们负责演唱。来华的每一批演员各在京服务一年，然后轮换。这家餐厅的价格不菲，每位客人点的酒菜最低必须够100元，点唱一首歌则是50元。它的特点在于，来这里的客人很少是为了来品尝乌克兰菜肴，而几乎都是为了来欣赏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歌曲的。谁爱来呢？当然是五十年代直接用俄语同“老毛子”打过交道的人们，他们来这里就是怀旧以及同老友相聚，其中就包括我同住在北京仍有联系的俄专的同班同学们的聚首。多好的机会呀！

在俄专，我给自己取了一个俄国男儿的名字—

一舒拉。原因是附中剧团曾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过苏联名剧《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剧中的小舒拉就是我扮演的。多年后，我还用舒拉这个笔名发表过文章。后来，一些对我五十年代的经历不甚了解的朋友曾问我，你好端端的一个中国人，干嘛要个起外国名字？我调侃地说，“我自称‘输啦’，不是说明我很谦虚吗？”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由于当时的校长是师哲，所以俄专师生是在我国媒体还未报导的第一时间得知的，甚至不迟于我的时任国家财政部长的继父吴波。

我的由校长张锡铸签署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公章却是“北京俄语学院”）的55字第143号毕业证书是1955年6月颁发的。其实，我在1955年4月9日已经奉命离校。那天上午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要我务必在当天（周六）下午，到位于东城区某胡



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办理到某单位就职的手续。我问是什么单位，他们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说我还没参加毕业考试还没有拿到毕业证呢。他们说不必了，毕业证书保证发给你。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欣喜若狂。哈哈！有证啦！不用担心考试成绩差啦！当天下午我到了人事部，他们给我开了介绍信，要我务必在4月11日到位于积水潭南侧的某单位去报到。我问那是什么单位，他们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报到后才知道这是总参通信兵枢纽部刚建成的（保密）二站的由穿便服的苏联军事顾问及下属军人来华培训使用管理和维护该站的我国通信兵指战员的一个项目。所谓“二站”，就是运用有线载波通信技术的“中南海——克里姆林宫保密热线”。我的职务是技术翻译。事后得知，命我报到的原因，一是我俄语过关，二是我出身好。

这里必须说明，我从1952年12月考入俄专到1955年4月9日离校，一共只读了28个月。所以，我的学历连大专都不够，高级工程师的职称与学历无关。

此前我偏爱文史，理化差劲。偏偏这里每天要讲的是军用电子、载波通信、脉冲技术等等专业术语。自己一下子从课堂上的外语高才生变成了工作

中总要出洋相（例如，多次闹出把“纱包线”译成“沙子包的线”之类的笑话）的生外行。当时真不舒服呀！也曾暗中抱怨，若是象宠爱我的老师曾经许诺的那样留校做语言学研究生或是被分配到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去翻译马恩著作或红楼梦之类该多好！但是，说到底还得面对现实。尤其是在那个年代，服从分配是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于是，为了面子只好拼命。夸大地说，这或许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要用功，第一次经历从无到有的磨练。在每天晚上到后勤学院上三小时的夜校学张家口通信学院的课程的同时，还要听苏联专家的个别辅导，自己再找苏联军事通信学院的教科书啃。毕竟是有压力，压力能变动力。事实证明我也并非天生只是学文科的料。工作中所需的理工科方面的专业知识，尽管不能（也无需）同专业人员比，却也终于应付了下来，而且显然给兵部首长王诤留下了“业务上还行”的印象。这一段的努力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直接的好处。干了三年，军衔没升，还是少尉一个，职务也没提，倒反而在五八年部队精简的大浪潮中由于我所参与的二站的建设和人员培训任务已经完成、几十位苏联军人已经回国、我已经没有具体任务，而被派往北大荒军垦农场去当摘掉帽徽肩章的农



工了。

北大荒的生活是浪漫的，尤其是因为我和一同从二站去的女友在那里结了婚。北大荒的生活不用说又是艰苦的。好在我们小夫妻都还皮实，吃得了苦。但是，远离城市甚至可以说远离文明，我们俩的专业知识都派不上用场。而作为农业工人我们又哪能同那些大老粗比！所以常常又是很苦恼的。我当时的确梦见过在北京的大街上散步。不过，我可没有在农场混日子。既然我是奶牛队的班长，我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挤奶、准备饲料、清扫畜栏以及放牧之类的日常工作。我要钻进去，我想我这辈子就跟奶牛干上了。所以我汇款给北京外文书店请他们把所有涉及畜牧的俄文书籍都邮寄给我。结果是，有一次来了一个苏联的畜牧代表团。他们参观牛队时我自然是陪同，而且我还可以直接用俄语回答他们的提问。临别时代表团的团长在感谢我的介绍和夸奖我们的工作之余，竟问我毕业于苏联的哪一所畜牧学院。我想，之所以会有此提问，很可能是由于我的介绍的专业程度。例如，在全过程中从我嘴里竟没有说过一个“牛”字。我的用语是“大有角偶蹄类”！

想不到的是，不到两年我就被王诤部长点名调回北京，爱妻也一起回来了。事后才知道，国家有一个苏联援助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制造项目，七六一厂承担其中制导车内装备的制造任务，来了一批苏联专家，需要比较熟悉军用电子的技术翻译。首长想起了我，才有了这个机会。

1960年夏，苏联专家撤退。一夜之间，我这个专职俄语译员失了业。在彷徨中，我继父劝我自修英语。他有一位挚友是外语学院院长。当时所在单位准许我出去公费代培，但需自己联系找代培单位，只要我继父说句话我就可以去进修两

年，但他偏不开口。“组织上不调你去脱产学习，你为什么不能自修？你那么聪明，小时候又学过，你



一定能学好！”高帽子一戴，我就飘飘然了。于是真的下了功夫，又是好胜心驱使，我一方面钻研技术情报（现在称“信息”）专业知识，同时拼命自修英语。每天晚上总要干到一两点钟，星期天总是带点干粮到北京图书馆去泡上一整天。这是第二次从无到有，这时我26岁。渐渐地，业务上有了点名堂，也出版了几个专题的资料卡片集，到1962年已经可以应付工作，以至1963年被连升两级，甚至在文革初期的大字报上被称为“反动技术权威”。然而，不久就是1964年春起为时两年半的下乡当四清工作队员，1966年支援在陕西铜川山沟里的三线建设后的文化大革命，1970年因为我会俄语，我家有苏联朋友寄来的照片，甚至上面有邀请我去苏联玩的留言，以及我妻子是报务员出身，我家又有收音机，我继父是“走资派”，我生母是“叛徒”……因此我涉嫌苏修特务而被下放烧锅炉。到1978年落实政策我重又回到技术情报室时，本专业的荒废已经整整十四年了。然而，在技术情报室我不但没有落伍，反而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的情报资料出手，引人注目。由于厂里不但要制造传播声音信号的广播发射机，而且还要开发播送图象信号的电视发射机，我甚至为了自己学习而把一本20万字的英文的《电视原理》翻译了一遍，使自己多少有了些同设计人员对话的资本。以致每次去西安、北京、上海出差搜集资料的申请报告都很容易被批准，直至被

四机部广播电视总局借调，在计划处带领一个十人小组，到全国东部几个大区搞行业装备调查和参与我国广播电视装备的规划的制定。

由于我有英语这个现成而得力的工具，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后，更快地进入新的业务领域。1982年我被杭州广播电视机厂招聘负责涉外业务。而这并非我的专业，此前我也从未接触过。所以，我又开始了第三次的从无到有，这时我48岁。我结合每一个项目的情况，从消化进而草拟各种合同文本及各种函电、单证入手，同学习各种实务（商务谈判、技术谈判、申请开证和委托汇付、报关、商检、验收、索赔以及人员接待等等）结合，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抠了一系列的国际商务公约和惯例。一本详解FOB和CIF合同案例的书都快被我翻烂了。为了明确概念吃透其精神实质，象《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这样的法规，我曾试译全文并同官方的文本对照。就这样，我从向内行请教最基本的知识和概念起步，到后来能独立地提出日本东芝成套彩电八五生产线的引进项目资料和合同文本（包括全部商务及技术附件），成为在总局召开的全国各厂拟引进项目评审会上代表杭电进行成功答辩的人和杭电在本项目中对外谈判中的主要参谋。我到杭电头一年的表现，就给了公司领导一个印象，认为此人拿得起来，在彩电生产线引进项目中不可或缺，以致在杭州严格控制进人、人控办停止办公的背景下，由温湖经理自己凭着他的老面子找了四位市级领导特批，于1983年春实现了全家五口从陕西铜川的荒凉山沟向人间天堂杭州的搬迁。

引进项目顺利完成。1986年初，我因母亲病危而请假回京照顾。中国租赁公司闻讯后急忙要借调我，因为八五彩电生产线用的是中租的钱，他们在合作中认识、了解了我，他们觉得需要我

这样的人。

在中租，我被指定专管项目审查并处理国内外合同纠纷。这里立即涉及我知识中的两个空白点：一曰项目评估，二曰融资租赁这种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特点及其法律关系。于是我又从头再来。一本《工业贷款项目评估手册》几乎被我翻烂，国际上关于融资租赁的公约、法规、年鉴、手册、期刊成了我的必读资料，其中许多内容被我译成中文。这是我第四次从无到有，这时我52岁。有了这一段紧急“充电”，才使我能够因“了解”融资租赁和“懂得”项目评估，而在53岁这样的年龄时仍被中外合资的中国康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所正式聘用。

我1987年11月被正式调入康富租赁。这时我已经不是什么生手了。但我没有满足于此。既然有了一个新的、而且是人们所不熟悉的舞台，我就要演好我的角色！这是我第五次，在我60岁前后的又一次“从无到有”和“由浅入深”。可以列为“从无到有”的内容的至少是我对融资租赁债权的测算、计算、核算方法的系统研究、据以提出并为本公司所采纳的融资租赁机构的租赁债权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及我所设计的对客户的财务状况的量化分析方法和表格。之所以说是从无到有，不仅因为这些成果本身是一种创新，因此财政部会计司在制订《企业会计准则—租赁》的过程中一直把我列为需要征求其意见的专家，尤其是因为我为此而首先自学了我本来毫无基础的财会基本知识。而我开始用电脑写材料和可以用电脑中的自动运算工具（Excel5）来进行财务分析这一点也是从无到有。这是迟至1997年7月的事，那时我已经63岁。至于说“由浅入深”，则主要是指民商法范畴内的法理知识，以及在这些知识指导下对各类经济法规的理解。至于对融资租赁交易法律关系的研究，则使我成

了本行业内这方面的专家，成为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时就融资租赁合同专章一再征求意见的对象。上述“研究”和“成果”，使我在公司的实务中，在内部核算统计分析方面、在项目评估审查方面、契约性文件拟制方面、合同纠纷和法律事务处理方面成为公司的主力，以致在1994年就应该办的退休手续一直拖到1999年11月才因为怕公司破产员工利益受损才办理。退休后我被返聘到2003年初。此后我曾任中国金融学会租赁业委员会专职高级顾问、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0年10月期满退任），现任全国人大《融资租赁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并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给融资租赁公司的员工讲课。2011年3月3日还给莱茵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讲了课。

2001年11月，我的104.3万字的专著《融资租赁——理论探讨与实务操作》出版。我国融资租赁行业元老闵一民在《序》中称，“本书虚实结合，全面系统，既有实践性，又有理论性，在许多方面均有其独到之处。……对于政府主管部门、经济金融界、融资租赁界、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均有裨益。”

1986年我被借调到某公司管投资项目审查。当时接到一个项目，承办单位由一位退居二线的副省长挂帅，他在中央又有支持者，以致各部委都盖章行文批准，只等我单位点头出钱。单位里，二把手急于要做，一把手进退维谷。既怕风险，又怕搞僵。我在审查中发现这个涉及1,600万美元的项目经不起推敲，经济上极不可行，风险太大。我一次次加大调查深度，一遍遍进行数据测算，用最大努力占有尽可能充分的材料。在预测时，把一切可能的情况，特别是对立面所强调的情况都充分估计到了之后，坚持了否定性结论，并且终

于被领导采纳。事后受到了好评。

2004年9月，我给商务部薄熙来部长发了邮件。我说，《融资租赁法》的起草工作已经列入十届人大的立法规划，由财经委负责主持，由商务部负责牵头。我对他的请求是：一、摆脱将融资租赁同其它租赁混为一谈因而合并立法的误导；二、确认融资租赁是金融业务因此应该由银监会统一监管，从而结束银监会同商务部分别监管的局面……我认为，由商务部牵头制订融资租赁法是不妥的，甚至可笑的。这项任务责无旁贷地应该由银监会来承担。并发去了我写的《对融资租赁立法之我见》供他参考。我对薄熙来一向十分敬重，但还是写了此信。

这就是我工作上对人对事的态度。



我们的法语启蒙老师——许渊冲

50级校友张燕龄

作者简介：

张燕龄，1950年至1954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1980年到司法部后曾任外事司副司长，中国法学会正局级国际联络部主任。1994年退休。

201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文化版，以大半版面刊登了许渊冲等五位老者荣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一新闻。这一奖项是中国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之前，只有季羡林和杨宪益获得过此奖。

许渊冲曾是50年代初北外法语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他是我们50届参干生学习法语的启蒙老师，我们也是他从法国回国后教的第一批学生。他获奖的消息传来，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许渊冲老师获得该奖，当之无愧。

许渊冲现任北京大学国际文化系兼英语系文学翻译教授。早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叶公超、钱钟书、吴宓等名师，物理系杨振宁与他在同一班学习英语，是他的同窗好友。在校读书期间，他的翻译才华就崭露头角。1941年，外文系几十位同学应征到陈纳德飞虎队任翻译。在招待会上，一句“三民主义”让随从翻译犯了难，当时也没人知道该如何翻译。这时，才思敏捷的许渊冲站起来说道：“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才使一头雾水的美国人恍然大悟，给尴尬冷场的招待会解了围，在场的人对这位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西南联大之后，他入清华研究院外国文学所深造，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就读巴黎大学，主攻比较文学。1951年，他作为爱国留学生回国，第一步就迈进了北外法语系。此后，在北京等地几个外语院校任英、法文教授。在授课之余，他勤奋耕耘，孜孜不倦，在



国内外出版了英、法文翻译作品和翻译理论专著达百部之多。上世纪80年代之前，他只出版了四部著作，其余绝大部分是年过古稀完成的。其中代表作有：《诗经》、《楚辞》、《中国不朽诗三百首》、《汉魏唐宋诗词》、《毛泽东诗词选》、《西厢记》、《埃及艳后》、《昆廷·杜沃德》、《雨果戏剧选》、《人世之初》、《约翰·克里斯托夫》、《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逝水年华》以及《翻译的艺术》、《文学翻译谈》、《中国翻译百谈》等。其著作所体现的惊人毅力和繁重的工作量对年轻人来说已属难事，许老师却在耄耋之年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不能不令人称奇。特别是他将诗译成英、法韵文更是谱写了翻译史上的新篇章，做出了光辉的贡献。杨振宁誉他为“诗译英法第一人”；钱钟书称他为“译才”，说他“译著兼诗词两体制，英法两语种，如十八般武艺之有双枪将，左右开弓手矣。”

他入选《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当代翻译工作者大辞典》中也有他的词条，上面赫然写着：许先生“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韵文的唯一专家。”

许老师治学严谨又灵活自如，凭借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大胆创新。他的翻译风格独树一帜，翻译理论自成一派。在文学翻译信达雅，直译和意译，形似和神似的传统争论中，他定位明确，旗帜鲜明。尤其是在诗歌的翻译中，他提出“意美、音美、形美”三美论，以“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为手段，达到“知之，好之和乐之”三之目的。坚定主张“以诗译诗”，反对把诗译成散文。他同时也是他的理论的完美实践者。在翻译过程中，他尽力做到三美俱全，遇到直译和意译，形似和神似的矛盾时，他最重“意美”，“音美”次之，最后是“形美”，发挥不同语言各自的优势，分别用加词、减词和换词的方法予以解决。他的诗译量很大，涉及三种语言以及中译英、英译中、中译法、法译中等多种领域。但他献出的是经过潜心研究的精品，表现了深厚的造诣和非凡的文采，传达美的境界，让人得到莫大的艺术享受。1984年，钱钟书看过他的《唐诗一百五十首》和《翻译的艺术》两部作品后，对这位“译才”高度评价说：“二书如羽翼之相辅，星月之交辉，足徵非知者不能行，非行者不能知，空谈理论与盲目实践，皆当废然自失矣。”

现举几例来看看许老师是如何笔下生辉的：

先看《大风歌》（汉·刘邦）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许老师的译文（中译法）为：

Le grand vent se lève, oh ! pour chasser les nuages.

Régnant sur la terre, oh ! je reviens au village.

Quels héros garderont, oh ! mon pays d'âge en

age ?

这首译文的精彩之处在于运用了法国人熟知的亚历山大诗体格律，即每行有12个音节，主重音在第6音节和第12音节，第6音节后是中顿，并采用AAA连续押韵法。亚历山大诗体是法国诗歌中的主要诗体，它对于法国人恰似唐诗之于中国人，凡是读过书的几乎人人耳熟能详。该译文与原文达到了形似与神似，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法国人读起来同样朗朗上口，从中感受到中国古典诗的艺术魅力。

再看《登鹳雀楼》（唐·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许老师是这样译的（中译法）：

Le soleil baise la montagne,

Le fleuve perce la campagne.

Pour voir un paysage plus beau,

Il faut monter encore* plus haut.

*“encore”一词，在诗中，因音节的需要可写作“encor”

这首诗的译文与上首不同，可以说是典型的“意译”。为了以诗译诗，达到美的效果，原诗中某些字句没有直译出来。许老师的意译可不是随意乱译，而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选词考究，用意译来表达原创的意境。如第一句中“baise”原意是“亲吻”，用这个词来描写原诗的“依山尽”，就使语言更有感染力。第二句中选用的“perce”是“穿越”，“穿透”的意思，用来描写黄河入海，就很有力度，读起来让人联想到大河的激流穿越原野，汹涌澎湃，滚滚奔腾，注入大海的景观。最后两句，许老师从

法文韵律的需要出发，用了换词的方法，其结果同样体现了原诗作者的登高远望，激励人们向上进取的精神。译文还严格遵照法文诗的韵律，即四行诗句，每行为8个音节，采用法国诗常见的AABB押韵法，使译文听起来铿锵悦耳，富有音乐的节奏感。

再看《约翰·克里斯托夫》中的一首诗，原诗文的字数分别为7·6·5·4·3·2·1，隔行押韵。许老师译为（法译中）：

法国人没有力量
禁止言论自由
不能把太阳
埋进地球
打个洞
没有
用！



这首诗巧妙地做到了原文和译文在字数、形状、音韵等方面完全一样的对应表达，体现了高超的翻译技巧，达到了“意美，音美和形美”的完美统一。

最后再来欣赏一下毛泽东诗词《如梦令（元旦）》中的一句：“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许老师的译文是（中译英）：

Below,below,
The winds unrolls,
Red flags like scrolls.

可谓词美，音美，意境也美。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钱钟书看了许渊冲翻译的《毛泽东诗词选》后，称赞他成就很高，说他是“带着音韵和节奏镣铐跳舞”。由此看来，许渊冲的某些作品被美国大学选作教材，199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许渊冲老师十分重视师生情谊。1999年，他年事已高，还兴致勃勃地携夫人照君参加我们这帮北外法语班老同学的聚会。他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套刚刚出版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法译本。聚会后，他给我和庄元泳来信，深情地说：这次聚会让我不禁想起50年前的往事，真是难得！还热情地欢迎我们到他家做客。他还几次寄来有关他翻译活动的资料，其中包括他在夫人陪同下，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赴港讲学的提纲和有关文章。在这次讲学中，他着重阐述了他一向主张的“诗词全球化与文化交流”。他强调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应走向世界。他说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如果能把历代名家的诗词首先译成具有“意美、音美、形美”的流通广的英文，一定可以使全球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今年是许渊冲老师九十寿辰，谨以此文为他祝寿，愿他如日之升，如月之恒。

致母校

张秋红（张天）

作者简介：

张秋红（张天），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

你留住我最美好的锦瑟年华。
我的青春流逝在你这明灯下。
我希望的种子在你这里萌芽。
我艰苦的远征从这里出发。

无论迎接春秋或者送别冬夏，
你都是我心中永不凋谢的花。
哪怕几十年漂泊在海角天涯，
我也忘不了你，我最慈爱的妈。

纵然在漫漫长夜里久久挣扎，
我也记住我在你怀抱里长大。
即使我流离失所，饱经风吹雨打，
我心坎里也有你这温暖的家。

就是风烛残年，我也听你的话。
靠你指引，我经得起大浪淘沙。

庆祝母校校庆

江承宗

作者简介：

江承宗，195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曾任驻巴巴多斯大使并兼任驻安提瓜和巴布达大使，
现任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七十年风雨历程，
小到大变化惊人。
与祖国共同发展，
今庆祝心绪激奋。

想当年“游击”教堂，
数十人转战征尘。
看今朝万人学府，
世界各地风采呈。

世情国情定教程，
挑战多样激励人。
师生协力谋发展，
前景光明同振奋。

欢庆时刻细思忖，
前进动力都靠人。
国家复兴基础立，
服务人民是根本。

敬贺母校70华诞赋诗二首

汪耀祥

作者简介：

汪耀祥，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曾任港澳台司副司长，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

北外的视野

1935年，民族危亡之秋，
历史伟人庄严宣告，
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精准预言，
新中国似一轮朝阳，将喷薄欲出。
六年后，抗日烽火连天，
一所新型外国语学校在根据地应运而生。
她，北外的萌芽，北外的雏形，
她，肩承光荣使命，
开始培养新中国特色的外语人才。
中国历史巨轮飞转，
人民站立起来了，改革开放了，
踏上伟大民族复兴的征程。
北外，紧贴时代节奏，
精砺淬炼，日臻壮美健硕。
中国之与世界，
或御敌卫国，或交友共处，或交流共赢，
但，中间隔着不同语言，犹如壁垒和荆棘。
北外，49种外语优秀人才的天职，
拆穿壁垒，拔除荆棘。
北外的理念：外，特，精。
北外的视野：聆听世界，推介中国。

北外人

一代代领导，老师，职工，
辛勤奉献不辍，将北外打造为，
知名学府，温馨摇篮，
为社会源源输送高素质外语人才。
正是这些外语人才，
组成了特别群体：北外人。
非志无以成学，
北外人立下坚定报国志向，
“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多么铿锵，掷地有声的誓言！
从而，非学无以广才。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北外人学习外国语，
争分夺秒，刻苦钻研，
娴熟读，听，讲，写，译。
毕业后奔赴各行各业不同岗位，
不求闻达，殚精竭虑，数十年如一日，
踏平艰险，何惧战乱，灾难，疾病。
自板门店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
闪跃过青年北外人紧张工作的身影，
崇山峻岭留下了北外人勘界的足迹，
凡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海内，海外，
总有北外人在。
啊，北外人，
用智慧和双手履行自己的庄严誓言，
从不停歇！

七律·母校颂（新韵）

——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 70 华诞

李金祥

作者简介：

李金祥，1973 年毕业于亚非系柬埔寨语专业。

一首老歌

葛维栋

作者简介：

葛维栋，1954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西法文系。

滚滚黄河似巨龙，
巍巍宝塔壮新程。
亦文亦武延安路，
能外能中抗大风。

凭字为媒识异域，
以言结谊会高朋。
欣逢华诞欢歌日，
雏凤清于老凤声。

一首老歌很少有人知晓
无论在解放前的上海滩
还是解放后的北京城

《永远为人民服务》这样一首老歌
唱响“北外”500 名参军的学子间
热血沸腾而来
唱着这首老歌而去
“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
我们就到哪里”
歌声响彻祖国四方

有春风满面在脸上的
有迷惑不解在心头的
有豪情壮志在胸前的
也有忐忑不安的……
这首老歌可能是朦胧你一生的诗

复合人才 卓越贡献

——访外交部条法司处长、我国常驻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高级外交官潘维煌
乔扬

简介：

潘维煌，浙江平湖人，1932年11月出生，先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北京外交学院英文高级研究班（接受同声传译训练），外交部公派赴美留学，获美国美利坚大学华盛顿法学院法律硕士学位，北京外交学院国际法硕士研究生导师。在我国外交部工作达三十余年，曾任外交部条法司处长，我国常驻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高级外交官，负责人权事务。任职期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和国际谈判，例如，“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四次），“荷兰海牙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适用法律公约”等，以及“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教育项目贷款协定”，“中美投资保护协定”，“中法、中意、中保司法协助条约”等谈判。办理了建国以来外交部许多重大法律案件。例如“中美上海电力公司案”，“中美湖广铁路债券案”等。现任北京天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复合人才 历练成钢

潘维煌16岁时考入复旦大学，大学期间选修英语，他的英语很好，当时甚至可以翻译西方著名诗人朗曼的诗篇。大学三年级时正赶上抗美援朝，年轻的他血气方刚，毅然投笔从戎，被分在南京空军部队，后来中央军委决定让一部分参干学生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外语，经过考试，他被分配到英文系二年级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工作。1959年他下放到良乡劳动，后接到外交部调令，到外交学院英语高级班学习，目的是将来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后，让他取代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口译译员。

1967年4月，XX国家大使馆的职员私闯我军事禁区，被扣。一天深夜，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要求亚洲司、条法司，负责办理此案人员于次日上午到国务院开会。周总理亲自主持了会议，陈毅副总理也参加此次会议，潘维煌当时是条法司此案的主办人员。开会当天，潘维煌进入国务院会议厅后，发现摆设非常简陋，出乎他的意料，只有几条长板凳



和一张旧课桌。潘维煌近距离感受到建国初期党中央勤俭建国的精神和周总理的表率作用。潘维煌亲眼目睹了周总理这一世界伟人的风采，周总理的平易近人与和蔼可亲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周总理进门时脸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摆摆手招呼同志们坐下，和同志们聊起了家常事。周总理关切地询问潘维煌的单位，家乡，年龄和婚否等问题，这对潘维煌来说是永生难忘的最激动的时刻，他倍感做一名中国外交官的光荣和责任的重大，这也是他献身中国外交事业的动力。

潘维煌80年代多次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对人权工作感受特别深。也遇到很多困难，因为西方国家的人权观念和我们是対立的。旧中国是一个被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物质非常匮乏。在这个时期，国家重视的是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要让人民填饱肚子，这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要知道，当时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挨饿，这也是第三世界很多国家最关心的问题。

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物质水平已比较发达，重视人民选举权和公民政治权利，西方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人民最需要的是什么，老拿中国的人权说事，所以人权工作是此后在外交上一要坚持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我国参加并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两个公约，潘维煌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初我国只希望参加《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后来，经过反复磋商和研究才决定参加两个公约，原因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某些规定在当时我国难以接受，如“无罪推定”和“法无明文规定者不罚”。潘维煌当时一直在第一线作战，对两公约的情况比较了解，而且这两条刑法原则是世界通例，并不涉及意识形态或有损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当然加入后国内刑法也必须做出修改。如果这个问题长期拖延不决，就会有损我国的司法民主形象，所以潘维煌大胆建议，主张早日参加。潘维煌作为外交部条法司主管人权事务的外交官，从国家利益考虑，起到了应有的参谋和推动作用。

著述丰厚 为中国的外交和涉外经济呕心沥血

潘维煌律师著述颇广，包括《联合国国际法院》《各国领海制度概述》《国家及其财产司法豁免》《关于保护外国私人投资的若干法律问题》《美国1976年对外国国家豁免法研究》（英文）《人权与民族自决权》（英文）《论人权与主权》，他还翻译了《国际人权法概论》（美国）（1995年出版）《外交学》（英）《联合国国际条约集》《各国商标法》（联合国）《领事法与领事实践》（美国）（“合译”最近将出版）。

“湖广铁路债券案”是中美建交不久后发生的一起重大的外交法律案件。1979年11月，美国阿拉巴马州公民杰克逊等，要求赏还1911年前清政府发行

的湖广铁路债券案欠款。本案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票送达人外交部长黄华。由于我国坚决反对美国法院对一个主权国家中国行使管辖权，所以拒绝出庭。1982年，美国法院悍然做出缺席判决。美国是一个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行政不能干预司法，所以想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案是很难的。但是我国外交部、司领导，策略地利用美国法院之友（amicus curiae）之类的司法程序，由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舒尔茨提出利益声明书并利用特别出庭、动议书之类的其它美国司法程序成功的突破了美国三权分立的防线。最后美国法院于1984年2月27日，以时效已过为由，撤销了其在1982年所做出的缺席判决，并驳回原告起诉。在此案中美国国务院干预了司法，而我国仍坚持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即美国法院无权对一个主权国家行使所谓管辖权，案件最后以我国的胜利和杰克逊等人的失败告终。在这一段时间中，潘维煌作为主管处处长担子也很重，他和处里其他同志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如翻译等，经常不辞辛劳开夜车完成任务。

1988年从瑞士奉调回国，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负责审理涉外和涉港、澳、台的经济案件。1990年在北京参加第十四届世界法律大会，任宣传部副部长，并负责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会上作的“法律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服务”的讲话。1991年作为中国最高法院代表团成员，参加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的“第四届亚太地区大法官会议”，。992年受最高人民法院指派参加我国《对外贸易法》的起草工作。1993年参加了国务院“1993年中国农行河北衡水支行开出的一百亿美元备用信用证国际金融诈骗案”专案组工作，任办公室法律组组长，案结后，受国务院专案组嘉奖。

潘维煌1995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在工作中他

坚持诚信和司法公正原则，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例如，在一起XX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XX省高院作出的终审判决有明显的错误和不公，他克服种种困难，向最高院提出申诉，后经最高院提审，撤销原判，维护了司法公正，受到当事人的赞许和好评。

他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就是能集“法律”、“经贸”、“外语”三位于一体，是一位知识复合型律师。他擅长办理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仲裁、项目谈判以及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人权保护等涉外案件。他从外交官、法官到律师，数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外交、外语和法律事业，他称得上是一位能同国际接轨、知识全面、合格的涉外律师。

潘维煌曾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国际仲裁员13年，现在仍然担任广州市仲裁委、柳州市仲裁委、呼和浩特市仲裁委等仲裁机构国际仲裁员。他还是上海复旦大学北京校友分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理事，欧美同学基金会常务理事。他一刻也不闲着，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份外的工作。

发挥特长 关注教育 义务培训青少年

潘维煌始终没有放弃学习英语，2006年时还参加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口语成绩依然很好。他不仅英语语法精通，口语流畅，听说读写译都很好。退休后的潘维煌向开阳里永乐居小区居委会领导提出举办暑期免费英语学习班的建议，提高小区青少年的英语水平。报名上课的学生有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虽然补习班学生年龄差距很大，英语水平差距很大，没有统一教本，教师只有一人，但潘维煌积极克服这些困难，重视学生提问，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照顾到不同年龄和不同程度的学生，教学联系实际，帮助学生学习电视、

报纸上等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英语。潘老师不仅指导学生练习对话、作文，还教学生唱《雪绒花》《友谊地久天长》等英文歌曲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

潘维煌对暑期免费英语学习班还有更深层的考虑，他向小区领导建议以小区为基层单位，把提高和普及英语作为一项日常工作任务，还可招聘大中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此项活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可根据其自身业务特点学习外语。潘维煌认为北京正在向国际大都市迈进，市民外语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也是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条件之一。

潘维煌还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复合型的知识传授给更多渴望在英语和法律领域发展的年轻一代，他希望能到高校给法学专业的学生们授课，也希望能找到法律英语方面的合作伙伴来为社会做点贡献。

回忆起在北外读书的日子，潘维煌印象最深，他说，那时北京冬天风沙大，在北京甚至还能看到骆驼。饭菜则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需要自己拿着勺子舀，完全是军事化的生活，只有周末自己偶尔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有一年暑假潘维煌回家探亲，不到三天突然接到校领导的电报，要求立即返校，后来大部队在三天前已经开往朝鲜前线，于是学校让他继续留下来学习，虽然他心中有遗憾，但是他意识到无论是去朝鲜，还是留在国内，都是在为祖国做贡献，“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潘维煌老前辈尽管年逾古稀，却有着了一颗年轻的心，进取的心，对祖国保持着炽热的情怀，对下一代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他热爱古诗词，最欣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祖国的自豪感时时感染着我们。他复合型的知识结构，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他的人生是丰富的人生，卓越的人生，他是值得北外为之骄傲的杰出校友。

四十余载 情系礼宾

——访校友马保奉参赞

王冠琳

简介：

马保奉，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从事外交礼宾工作40年。被聘为外交学院兼职教授。著有《外交礼仪漫谈》、《礼宾春秋》。

北外校庆七十周年在即，为激发大家了解礼宾、礼仪知识的兴趣，为校庆筹备工作增添一些实际内容，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老校友、老礼宾马保奉参赞。

艰苦岁月读北外 收获丰硕

马保奉1960年到1965年就读于北外俄语系。那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伙食定量，半饥半饱，有时午餐也只能喝上稀粥。大学五年虽然艰苦，但是学到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以后如何做人奠定了基础。

入学时，俄语系60级有8个班，后来外交学院并进一个班，共9个班，学生140多人。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的约30人，大部分表现优秀，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马保奉说：“在校期间，虽然物质条件差一些，但同学们精神面貌不错，大家都能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抓紧专业学习。学校想方设法培养我们的外语实践能力，如听俄语录音、广播、看俄文电影等。与其他院校相比，北外毕业生的听、说、译等能力，具有明显优势”。

除了外语，同学们也积极响应学校号召，参加一定体力劳动和社会实践，向工农兵学习。马参赞举例说，他所在的7班同学，曾利用周末时间，到崇文区找著名劳模时传祥，参加掏粪义务劳动。

马保奉回忆起进外交部的情形。65年5月，外交部派人到俄语系考试招人。他说，有一天，他们十几个同学，被



召集到系办公室，开始并不知道干什么。外交部的来人说，请仔细听一段俄语新闻广播，然后请大家回答问题。随即打开收音机，听了20多分钟。十多个同学的回答都顺利通过了，可见当时北外的教学质量是不错的。

周总理亲历亲为 感触良多

到外交部后，马保奉去山西汾阳参加“四清”一年，66年8月到礼宾司上班，至07年在礼宾司返聘结束，前后四十余年，基本上是在礼宾司，其间还曾在驻外使馆工作十多年，也是做礼宾工作。”

他说，做礼宾工作，常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必须衣冠楚楚，俨然一副当官的模样。其实，所谓礼宾官，实际上是为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客人服务，不是什么“官”，而是名副其实的勤务员。再说，“礼宾官”的“官”字，在社会上常被读做“官儿”，令其贬值不少。

不过，回顾一生的工作，马保奉说：“虽然礼宾工作并不被人看好，可是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感觉不错。礼

宾工作毕竟是潇洒的，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以及中南海，有机会亲眼看到中央领导人，可以近距离观察领导同志，感受他们的伟大人格。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我都见过。”他话语之间流露出一种自豪感，和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敬佩。

1970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作为礼宾人员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毛主席。当主席听到一工作人员自报说：“我姓倪，人字旁一个儿字”。主席反应很快，说：“噢，那你就是人民的儿子咯！”主席的幽默和睿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礼宾官给主席介绍朝鲜大使玄峻极时，主席说：“怎么，还有姓玄的？”

说起周总理，马保奉更是饱含深情，发自肺腑。他说，文革开始，刘少奇主席被打倒，来访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由周总理接待，其忙碌是可以想见的。可是他工作细致认真，从不马虎，批阅的文件，连标点符号错误，都给予改正。他常常发现、解决连礼宾司都难以觉察的礼宾工作中的失误。比如国宴的讲话安排，就是总理亲自纠正的。那时国宴，一开始就讲话，而我们讲话常常会提到“苏修”，于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使节，就会退席以示抗议。周总理觉得这样不好，既然请人家参加宴会，又不让人家吃饭，有悖待客之道。他把礼宾司领导找去，

一起研究解决办法，决定把讲话时间推迟到吃完热菜以后。这样，苏联等退席的外国使节就可以吃上饭了。多么英明！多么人道！难怪李先念副总理评论说：“周到、周到，周总理一到，你就放心吧，一切都安排好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的。”

周总理还曾亲自做具体礼宾工作。马保奉介绍，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赫鲁晓夫、胡志明、金日成等共产党领袖都来参加我们的庆典活动，国庆宴会的席位安排颇费心思，于是周总理自己动手，前三桌的座位就是他亲自排列的。马保奉说：“当我在外交部档案中亲眼看到，周总理用红蓝铅笔亲自书写、勾画的那场国宴席次图时，心情依然激动不已。”

马保奉讲述这些故事，如数家珍，时间地点以及事情原委，清清楚楚，展现了一位老礼宾，对其业务的熟悉和热爱。

老骥伏枥讲贡献 情系母校

谈到涉外文明礼仪教育问题，马保奉表示出某种忧虑。他说，近几年，外事部门和一些大学，对这个问题已经开始重视了，但是总体状况并不乐观。他发现青年人对此关注度并不高，只喜欢听热闹的礼宾故事，而对礼宾知识的细微之处并不在意。马保奉认为，一些年轻人浮躁，以后一

定会付出代价的。马保奉说，礼仪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国家复兴、强大，文明礼仪教育不能滞后。礼仪内涵丰富，涉及美学、法学、哲学等多学科综合知识的运用。大学义不容辞，应该教给同学们一些基本知识，进行一些基本培训。他强调，礼仪教育对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成长，意义重大。

提到对校友会工作的建议，马保奉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身体尚好，有时间和精力，应该为学校做点事。我们这一批退休的老校友，在外交战线上摸爬滚打几十年，都有一番经历和专长，应当让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都贡献出来。前年北外开了一个好头，曾邀请一些老外交官来校讲实用外交学。这批人脑子里东西不少，是富矿，值得开采，希望母校能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马参赞满怀信心地说：“过来这一学期，我已经为北外国际关系学院四个班70多名同学开了20个课时的礼宾课，起步顺利，愿意将这项工作搞下去。”

“北外70年来，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外交人才，外交部、各驻外使领馆，不论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北外的校友。未来的外交事业，仍对北外期待很多。希望北外发扬光荣传统，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马保奉的殷切寄语，让我们北外年轻学子，倍感使命的庄严和神圣。

鸿鹄志高远

——访高志凯校友（大和资本市场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区主席）

于书茵

简介：

高志凯博士，1962年生于苏州，1981年毕业于苏州大学，获英国文学学士学位；1983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训班，获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学文学硕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耶鲁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J.D.）。

八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后，高志凯博士进入中国外交部工作，担任邓小平和其他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文翻译。后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成为美国纽约州注册律师。其先后任职的公司和机构包括中国外交部（北京），联合国秘书处（纽约市），美国 Milbank Tweed Hadley & McCloy 律师事务所（纽约市），美国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香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北京和香港），电讯盈科，恒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等，并是中央电视台特约时事评论员、财经评论员（中文国际频道、中文新闻频道和英文新闻频道）。此外，高博士还担任苏州大学校董、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等职。高志凯博士目前任大和资本市场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区主席。

2011年6月22日，记者有幸采访到了北外校友高志凯博士。高志凯博士儒雅、智慧，侃侃而谈：自1981年考入北外，一路已是三十年。

峥嵘恰少年 青春正当时

1981年，19岁的高志凯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训班读取硕士学位。谈及北外，高志凯深情地说，在北外的学习生活是永远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而在北外打下的扎实外语功底也是后来自己人生发展的重要基石。



说起曾经的校园生活，高志凯笑说当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ABC，日子简单而充实。最常出入的地方就是图书馆、资料室，找各种录音带来反复练习同声传译。印象很深的事情包括去中国剧院

救火，在苏州街角用粮票换取如同奢侈品一般的花生米。

高志凯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翻译了一篇名为《拿破仑死亡之谜》的文章并投稿，而当杂志刊登出自己的作品时，竟不敢相信杂志上刊登的译文是出自自己之手，虽然翻译姓名跟自己一模一样。他特意打电话给《世界图书》杂志编辑部进行确认，方才确信译文果真是自己的作品。那时候每个月学校给的生活补助只有20元左右，而这篇文章的稿费是97元，这对于当时的高志凯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更是重要的肯定和莫大的鼓励，坚定了他刻苦学习英语的信念和信心。

1983年春，在北外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高志凯被派往日内瓦，在万国宫给国际劳工组织大会做了两周同声传译译员。高志凯用“大开眼界”一词形容了这次经历。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切身感

觉到国内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多么的落后。一路上同学们交换心得体悟，无不深有感触。21岁的他忽然成熟了很多，中西方的对比和差距使得他的责任感更加强烈。

“先知”传音筒 鱼钩与长矛

21岁北外毕业后，高志凯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他笑着说，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一心想去联合国，可惜联合国秘书处虽然寄来了聘书，但是外交部却不肯放人。经过十年文革的浩劫，我国当时太缺乏高素质外语人才了，国家又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百废待兴，外交部把高志凯当作人才，执意留用。高志凯从不安心工作到自觉奉献，经历了人生的一大转折。一次在十三陵国际友谊林临危救场的翻译经历，使得高志凯深深体会到虽然英文翻译工作本身十分平凡，却是党和国家外事工作缺一不可的关键环节，职微作用大。高志凯从此端正心态，踏踏实实，勤奋刻苦，自觉自律地留在外交部，做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这份重要工作。

当时的中国刚经过文革重创，确实缺少优秀的翻译人才。而高志凯凭借年轻、个子适中、反应灵敏、嗓音条件好、语言功底强、政策觉悟高等多种因素很快脱颖而出，成为邓小平的英文翻译。高志凯回忆说，其实给小平做翻译难度很大。一是小平四川口音很重；二是小平话语不多，但是只要开口，必然是一字千钧，一言九鼎。小平不说大话，句句切中要害，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小平会见外宾几乎从来不用外交部事先备好的说帖，常出新意，除了外交问题外，更对改革开放、国家政策、接班人问题等诸多方面广泛涉及，经常是高瞻远瞩，具有高度洞察力和前瞻性。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收录了多篇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其中不少是高志凯当时陪同翻译的。高志凯感慨地说，能够在那样的历史瞬间紧靠在伟人身边，亲历诸多重要场合，倾听

伟人声音，领悟伟人精神，并担任伟人的传声筒，将伟人的思想言辞传播给国际友人，确实是三生有幸，终生难忘。

说起小平，高志凯笑着回忆道：小平当时没有一个特定的头衔，也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惯用称谓，像“小平同志”、“邓公”、“邓先生”这样的称谓都不适合高志凯当时称呼小平，以至于高志凯在小平身边工作的年月里，从来没有直接称呼过小平。离开小平之后，高志凯一直在想，如果能够再次见到小平，到底应该如何称呼他呢？很久之后高志凯终于明白了，应当称他为“先知”。当我们民族和国家被错误的意识形态牢牢地禁锢、根本不知道出路在何方的时候，小平就像是站在山顶，振臂一呼，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指明了方向，他用魄力、毅力、智慧、果断和勇气把我们带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小平为我们指明的方向，继续在引导我们，他的预言已经实现，他对未来的预言也将实现。他是中华民族的先知。

如果高山就在你的面前，你往往难以真切感受到高山的巍峨壮美。只有当你退出一定距离，回首遥望，才会被高山的雄伟壮阔所折服。高志凯说，当年给小平做翻译的时候，年纪尚小，悟性尚逊，每天忙碌于繁重的工作任务之中，很多问题无暇仔细思考回味。而当伟人远逝离别之后，国内国外的局势发展不断验证了小平的远见卓识，高志凯静心回望历史车轮留下的轨迹，越发深切领悟到小平功垂千秋的雄才大略。“小平个子不高，却是历史舞台千载难逢的巨人。”

追忆小平给自己的影响时，高志凯还特别提到：小平给我的一大启发，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抽象理论具体化，切中主题，抓住本质，凡事只求解决问题，不求枝节，远离花拳绣腿。正是有了这层感悟，在备战北京奥运时高博士及时提出了“鱼钩与长矛”方法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得到广泛使用，为奥运会安保工作做

出重大贡献。该理论受到多位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并为此做出专门批示,成为奥运时被广泛执行与应用的的方法论。奥运结束后,中央电视台特别制作了《奥运档案 鱼钩与长矛的故事》纪录片,反复播放,深受好评。

记者有幸聆听了高志凯深入浅出地细致讲解了鱼钩与长矛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大有体悟、深受启发。如果说鱼钩是诱饵,杀招埋伏在后面等人上钩;那么长矛便是凶器,没有遮掩正面对敌。我们要分清事件是鱼钩还是长矛,才能有针对性地成功解决问题。“对付鱼钩要忍,要巧,要学邱少云,对付长矛要猛,要狠,要学黄继光。”后奥运时代,钩矛理论在生活中亦有着广泛的应用,二者相合相离,变化无穷。高志凯正在撰写一本系统讲述钩矛理论的著作,记者真切地期望该书早日问世,为读者们带来更多启悟。

真才如美钻 面面可生辉

真才当如美钻:他们不断打磨锤炼自己的每一个侧面,无论选取哪一个角度,无不晶莹剔透璀璨生辉。很多人都会震惊于高志凯政商两界的丰富传奇的任职经历,他自己也笑言,的确走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事。

高志凯在九年半的时间里,在三所学校攻读四个学位,包括一个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横跨三个不同专业:北外的同声传译、耶鲁的政治学和法学。高志凯申请耶鲁研究生院和耶鲁法学院时,基辛格博士两次为他写信推荐。此外,高志凯先后任职的公司和机构包括中国外交部(北京),联合国秘书处(纽约市),美国 Milbank Tweed Hadley & McCloy 律师事务所(纽约市),美国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香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北京和香港),电讯盈科,恒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等,并是中央电视台特约时事评论员、财经评论员(中文国

际频道、中文新闻频道和英文新闻频道),目前担任大和资本市场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区主席。

讲到这里,高志凯感慨地说,自己赶上了中国迅猛跳跃式发展的好时候,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只有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经受翻天覆地变化,不断涌现并接受新生事物的大环境下,一个人才有机会、有可能走出这样的成长发展轨迹。今时今日自己做过的事,都是三十年前在北外学习时不敢想象的。比如国内国外的工作环境跨度;同传、律师、金融、石油、互联网、传媒等各种中国最领先、最有挑战性的新兴热门行业跨度,自己都有幸参与,实在是难得的人生经历。

当然,机遇与准备总是紧密联系着的。高志凯笑着告诉记者,自己所学习的专业跨度大,可塑性很强,真可谓“技多不压身”。国内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速度快,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种挑战不断涌现,对人才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变化,不时会涌现出各种新的机会。只有自己百炼成钢,练就浑身本领,才能时刻做好准备,机会来了才能担当得起。高志凯同时也强调,自己好奇心强,精力旺盛,兴趣广泛,勤奋,乐于超时工作,乐于广泛涉猎各种新生事物,闲不下来,也停不下来。更热衷于公共服务,平时经常建言献策,就各种问题提出各种大大小小的建议和意见。

“当然,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不能说哪条路更好。无论做了什么选择,都要积极面对挑战,绝不后悔”,高志凯如是说。

长达两小时的采访结束前,高志凯博士微笑寄语北外后来学子:胸怀大志,脚踏实地,勤奋刻苦,勇于拼搏,珍惜当今,放眼长远,立足中国、胸怀全球,把全世界当作自己的人生舞台,天生吾才必有用,成就辉煌更待何时?这朴实真切的话语里,记者看到的是校友们熠熠闪闪的流金岁月,和北外人代代相传的优秀品质。

“要为梦想拼一把”

——访 VIVA（维旺明）无线新传媒副总裁王洁明

乔扬

简介：

王洁明，浙江绍兴人，1993—1997 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典语专业学习，毕业后在新华社从事13年与媒体相关的工作，先后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环球》杂志编辑部主任，新华社驻北欧记者，《环球》杂志事业拓展总监，主任编辑；瞭望周刊社网络信息部副主任，副总经理，数字媒体筹备组副组长。北京瞭望广告公司董事，《财经国家周刊》筹备组副组长；曾出任澳门最大杂志《机遇》总编辑，是国内最大的电子商务翻译网站“随你译”创始人之一。王洁明还曾任瑞典乒乓名将瓦尔德内尔、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诸宸等的经纪人，并在公关和广告业方面有诸多建树。2010 年 6 月，投身移动互联网，任国内最大的手机杂志运营商 VIVA（维旺明）无线新媒体副总裁。

采访王洁明的地点，是在北外校园。“大家对一个移动互联网媒体的创业者最初是学瑞典语的，感到很吃惊，”王洁明对本刊记者说，“不过，我只是觉得，不管你最初学的是什么，如果有梦想，这一生一定要为梦想拼一把”。

初入北外显才情

九十年代初，北外是唯一开设瑞典语专业的高校，那一期瑞典语专业只招 14 人。由于新华社需要常驻北欧的记者，北外招收北京外生源，到了绍兴王洁明所在的中学。王洁明那时是高中文科班班长，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到瑞典班，并且是唯一的京外学生。在北外的日子里，周末少有同学的陪伴，但是王洁明的生活并不单调，他曾是北外演讲比赛冠军，同时是很多校园学生活动的发起者与创办者，他创办了北外新闻中



心，从最初只有几个人发展到具有 6 个部门，七十多人的规模，其中就包括学新社、虹工作室和《北外风》报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些组织与报刊在今天的北外学生中依然具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学生时代就展现了良好的策划能力和组织能力，也是文艺骨干，组织了很多场高质量的晚会，成为当年北外的轰动事件。对于艺术他有独到的理解与感悟，课余时间，他还到附近的北京舞蹈学院学习芭蕾等舞蹈课程，在学校又是演小品，又是编舞，活脱一个文艺骨干。“上学时，有一个人到德语系做讲座，曾说过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我只求这一生在某一个领域留下一点东西，哪怕这个领域很小很小。’我觉得，这就是梦想。”

北欧历练蕴实力

1997 年，王洁明毕业后顺利进入新华社国际部。

和在学校时一样，媒体并不是王洁明唯一的诉求，“我总喜欢尝试新的东西。在国内搞国际新闻，其实是比较无趣的，并且当时上班真得很闲。所以，这迫使我寻求另一些成功感”。2000年，他和央视著名导演邹友开一起策划了中国瑞典建交50周年大型演出，成为国内最年轻的大型演出策划人。2001年，他开始迷上投融资。在他的策划下，“外资企业中国上市研讨会”成功举行，嘉宾如云。研讨的议题在今天看来都很有前瞻性。同年，他接受瑞典外交部邀请去瑞典考察文化产业，在那里巧遇世界乒坛传奇瓦尔德内尔，最终成了老瓦的第一任中国经纪人。回国后，又做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诸宸的经纪人。

2003年他被派驻斯德哥尔摩，负责报道瑞典、挪威、丹麦、冰岛的新闻。开始做一个驻外记者该做的事，在一个并不产生很多重大新闻的国度里，他还是写出了数篇获奖稿件。“其实，那些年，我一直在不同的领域寻找，看自己的梦想究竟会在哪个领域。做了一些很让外人震惊的事，也失败过一些事，但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路。”

展翅翱翔新传媒

2005年王洁明回国，那时他周围的人有的在新华社一路高升，有的跳槽发展很顺利。他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道路，“至少我一定不能光凭兴趣乱做事了。我想了想，还是应该专注在媒体运营上”。他选择从相对稳定的国际部转到了新华社的《瞭望》周刊。具体工作也从做内容转到做他最感兴趣的运营，广告、发行、市场推广、活动举办。那个时候，互联网泡沫刚刚结束，王洁明发现，传统媒体受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互联网产业本身鼓励创新的那种味道很让我着迷”。于是，他开始研究互联网，和北外同学一起创办的“随你译”已经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电子商务翻译网站，7万

多名翻译和300多家翻译公司是注册会员。公司还入选了一年一度只有20家企业被选择加入的创业“摇篮计划”，导师就是李开复。“那个只是我业余参与模式锻造的一个公司。我更喜欢的还是传媒。但与此同时，我越来越觉得，在国有体制内搞新媒体是很痛苦的事。如果要实现理想，必须做出选择。”

王洁明离开新华社的时候，在《瞭望》正是蒸蒸日上。作为主要负责人，他参与了新华社第一本财经杂志《财经国家周刊》的创办，又开始全面负责瞭望四本杂志的数字媒体建设。但在那个时候王洁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即中国网通创始人之一的韩颖。当时，他正在做手机杂志的创业。“我觉得我没赶上最初互联网的那股浪潮，移动互联网这一信息技术产业的第五次革命我一定不能再错过了！”2010年夏天，王洁明选择了离开新华社。当时在新浪微博上发表辞职声明时，迎来一片叫好和鼓励声。在他负责公司运营的一年时间里，VIVA成功地从一家电信增值业务的公司全面转型为媒体公司。目前，在智能手机上用VIVA客户端看杂志的用户已经超过了2000万。除苹果手机外，国内主流的ANDROID系统的手机如三星、索

爱、HTC、LG、摩托罗拉等全部预装了“VIVA畅读”客户端。中国最主流热销



的二百多种杂志都选择了和VIVA合作。微软PHONE7系统亚洲首发,也把VIVA列为其唯一手机杂志应用合作伙伴给予预装。2010年底,VIVA畅读iPad版应用程序上线5天就成为中文iPad免费应用书籍类冠军。

能赢得多方青睐,关键在于VIVA开创了手机杂志新的产品和运营模式。从一开始,VIVA出品的客户端手机杂志就不是简单的杂志内容翻版,而是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来专门转化刊社原始PDF素材,从内容到形式都精心策划和制作的手机杂志产品,并且文件很小,不费流量。VIVA还是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最大的手机杂志的合作伙伴。“我们现在选择和电信运营商合作,尝试杂志付费阅读。而自有客户端则选择免费看杂志,用广告进行盈利的模式。”

“相对来说,一个既懂内容又懂运营,还懂投融资,对管理也有不少心得,又有一颗创业心的人,是非常少见的。我觉得洁明以前那些看似不相干的丰富经历最终塑造他成为这样一个类型的人。关键,可能是他在学校时就爱折腾。”王洁明在“随你译”的合伙人,CEO孙慧嘉评价他说。

一开始,VIVA仅仅是把报摊上有的杂志搬到手机和IPAD上供人阅读,王洁明进入VIVA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内容多元化。“其实,杂志就是个壳,里面可以装任何内容。而一旦用户积累到一定阶段,它就有了传播性和话语权”。于是,在他的策划下,VIVA成为了博鳌亚洲论坛的独家无线新媒体合作伙伴。VIVA还是《中国达人秀》的独家手机杂志合作伙伴。东方卫视播一期栏目,VIVA就同步推出一本手机杂志。据介绍,VIVA现在正在和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决赛谈合作。“8月初,大家就能在VIVA畅读上看到世界小姐的系列杂志了”。

现在,王洁明已经是不少论坛和媒体的常客。“当年在北外拿过演讲冠军,主持很多晚会,至少让我和

其它创业者比,现在在台上说话还是具备一定优势的”王洁明笑道,“不过,我觉得,大学时光,学校的那种开放式的校园文化,对我的锻造是最有影响的。我那时经历的,把一个社团从2个人折腾到70个人,并且延续到现在的事,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创业啊。我以前也曾自嘲,学外语没专业,但也许恰恰是这样一种特性,让你更开放,更容易有创新的勇气。”

王洁明作为企业领导,在制度上也做了创新,他提出了错峰时间上班,不坐班的管理方式,也为技术人员设计了专业对口晋升体制,他的管理理念是让每个人做适合自己的工作,他相信当一个人喜爱自己的工作,并且创造出价值时,这个人一定会有积极的变化。他很注重放权,用人时不加以干涉,只做推荐,充分授权于下属,赢得了下属的支持。进入VIVA工作,他也始终不改文艺的气质,开年会时也不乏创意和亮点,有别于一般互联网技术型公司,王洁明要求所有职员穿正装或礼服出席年会,并且男生必须携女生入场,同时评选出最佳着装的人,让一个普通的年会充满了时尚气息,同时也加强了员工对于企业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他甚至改编《传奇》的歌词,自制歌曲《VIVA传奇》,作为高管的合唱曲目。对于艺术与时尚,王洁明将其作为一种终生的爱好,他相信人可以永远活的很年轻。

摩根斯坦利曾称移动互联网为信息技术产业的第五个时代。展望未来,王洁明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VIVA能成为所有使用智能手机和IPAD用户的必装软件,所有人都能在VIVA上找到自己爱看的東西。

作为前辈,王洁明寄语北外学子:在学校里,不要过于追求分数,多一些社会实践和人生历练很重要。他还希望北外学子要做一个有梦想的人,他说,梦想不一定非常大,但是要有,要去追求。这样,人生才有意义。

在路上

——92级曲宏校友访谈

谷雪妮 乔扬

简介：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92级校友，在读期间曾任第十届学生会主席。曾于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工作七年，现任博雅公关公司政府关系与公关政策首席顾问、总监。

路易威登曾经说过，所谓旅程，不是旅游也并非假期，而是一种自我探索的过程。面对漫漫人生之旅程，有人乐于康庄大道的稳定与安闲，有人则志在追求不同的风景、不同的积淀，在挑战与超越中实现价值。曲宏校友正属于后者。

缘起 北外

谈起自己在北外的四年，曲宏称之为“最美好的时光”。这种美好不仅来自于其充实的学习生活，更是来自于参与举办丰富多彩的学生会活动。

曲宏最早在校学生会宣传部工作，后被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改选后成为主席。在参与举办的各种学生活动当中，最令他难忘的是为期一个月的“北外艺术节”。从全校规模的文艺演出、才艺展示、主题讲座，到零点乐队等知名艺人的倾力加盟，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水准之高都是当时北京其他各大高校难以媲美的。

当然，举办这种历时长、规模大的活动也要面临很多变数，如资金问题和场地的申请等。这些都没有固定的解决方法，需要随机应变，在巨大的压力下迅



速有力地解决。曲宏告诉记者，在学生会的工作让他的学习、组织以及人际交往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同时，在尝试做不同的事当中他也平和了心态，积累了做事的风格与习惯。在北外的时光是美好的，同时在学生会的经历也成为了他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

不同的路 不同的风景

从北外毕业后，曲宏在众多去向中选择了商务部（当时为外经贸部），在美洲大洋洲司工作。由于专业是西班牙语，他经常在拉美地区出差，并曾常驻智利。可以说在外人看来，这份工作应该是极其理想的，因为政府机关的工作平台高，社会地位高，而且很稳定，可以称之为“金饭碗”。但是，在商务部工作了7年之后，他做了一个令周围人很不理解的决定，那就是辞去商务部的工作，尝试不一样的挑战。

“可能是性格使然”，他说道，“很多人追求安逸，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希望体验不一样的挑战，锻炼自己，增加阅历。”于是，他放弃了“金饭碗”，踏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他曾参与组建过合伙制公司，开设过培训项目，甚至做过餐饮项目。其中餐饮项目的经历尤其令他难忘。“我们要建一个600平米的饭店，从它的招聘、进货、装修到成本核算、定位方向等都要负责。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对于缺乏实际经验的我是一种锻炼。”

比起之前稳定的工作，他辞职后的这些经历充满着艰苦与挑战，但正是这段经历让他走出“象牙塔”，使他能够从更加商业与实际的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面临高压也能从容不迫。通过这段与众不同的经历，他体验到了别人不曾体验过的风景，而经验的积累也为他接下来要走的路打下了铺垫。

在路上

事业发展的另一个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曲宏被推荐加入博雅公关公司，负责政府关系与公共政策领域。

博雅公关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关公司之一，拥有着覆盖全球的公关网络平台。经过两年的发展，2007年，曲宏着手建立了一个新的独立运营的政府关系与公共政策部门，旨在为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以及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政策分析与战略咨询，为其业务发展与扩张赢得政策上的支持。曲宏凭借其在商务部工作时积累的坚实的政府背景以及之后丰富多彩的创业经历，对政府关系与公关政策有着广泛的了解和可靠的洞察力，同时又能够很好地理解企业的运作方式和核心需求。

他介绍到，通过这项工作他可以接触到诸如能源、电信、化工、快速消费品等不同行业，与团队一

起为各国的领先企业提供解决方案。看到自己团队提出的方案可以为一些企业带来质的飞跃是很有成就感的，但另一方面从事这一工作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有时一天他的团队要开很多会，而由于客户不同，会议内容也是跨行业的。要想胜任需要综合且快速的学习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将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建议整合起来，满足客户的高要求。“只靠某个学历或技能是不行的，它需要广泛的知识背景与综合性的解决问题能力。”曲宏告诉记者。而这些知识与能力正是源于他的日积月累，源于他所走过的路。

当记者问及今后的发展计划时，曲宏说：“做事的结果很重要，但过程也同样重要。我还会坚持按照自己的兴趣，走适合自己的路。未来我还有可能尝试新的东西，迎接新的挑战。”

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精彩。在记者看来，曲宏的精彩在于他一直在自我探索，自我挑战的路上，在挑战中体会快乐，在挑战中实现卓越。



沈晓春 开拓数字北外“e时代”



豪萨语、信息技术中心、数字北外，三个词语圈住了一位北外人，沈晓春。对于众多北外校友而言，他很陌生，因为2000年毕业于当时亚非系的豪萨语专业，然后留校任教。对于大部分在读和在职的师生员工而言，他很熟悉，因为每天都会碰面的“数字北外”公共信息平台和一卡通系统，由他主管建设、运营和维护工作。

在北外70年校庆之际，一个长于斯、成于斯的年轻人将以怎样的心境看待成长，将会怎样回报母

校的培育之恩？本刊记者拜访了沈晓春老师。

【是兴趣，也不是兴趣。】

沈老师的办公室是一个不大的空间，布置整齐、敞亮。办公桌后的书架上放着很多电脑和网络资料，还有各种文学著作和豪萨语书籍。除此之外，书架的小格中摆放着一些小模型和装饰品。在工作之余，这些小物件成为他把弄的道具。

一位如假包换的豪萨语老师，转行成为“网络信息工程师”，是不是不务正业？动力在哪儿呢？沈晓春自己认为，是兴趣，也不是兴趣。“开始钻研这个行当，是因为兴趣。”但是他觉得，“任何源于兴趣的东西，当它成为工作的内容时就会不一样了。兴趣是个人化、理想化的东西，当有闲或者有钱的时候，可以去想起它。但是如果兴趣成为工作，就必须有妥协了，兴趣会因为在工作时的妥协而慢慢消退。”

【特殊的技术团队。】

在单位里，沈晓春还管理着一个特殊的技术团队。与其说是管理，不如说是培养。这支技术队伍是由北外各院系学生组成的，他们因为对网络和计算机的共同爱好而走到了一起。为了能够满足他们的学习兴趣，沈晓春会定期在课余时间为他们开设网络和计算机培训课程，同时，也会让他们动手解决一些网络工作中的简单问题。“处理技术问题，一方面是考验能力，但更多的是在考验耐心”。沈晓春这样说道，“这支队伍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

们对网络有兴趣，就在课余让他们学习一些，参与一些。这样他们既获得了知识，又能够帮我们缓解一部分的工作压力。

【70 周年校庆后，数字的北外会更好！】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信息化建设成为中国高校的重要任务。“北外培养了我，我也应该为北外做点什么吧！”沈晓春的面色露出少有的凝重，他希望自己能够为北外的信息化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

“没想到会那么难。”他说，“起初以为建设数字校园，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就可以取得进展。”对此，他信心满满。但是，慢慢地他发现，技术问题只是建设过程的一环，更重要的是要理顺管理体制。制度建设和技术进步，缺了哪一个都不行。“其实光技术问题的难度，就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然而，功夫不怕有心人。凭着执着的探索和奋斗，如今“数字北外”平台系统已经初见规模。“建设起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么一个平台能做的事很多。但是也会派生出很多新的问题。”沈晓春直言不讳，“我们的‘数字北外’理念比较超前，属于跳跃式的发展，因而忽视了用户正常的成长过程，所以很多初级用户一开始很难接受。”“随着用户水平的不断提高，高级用户则对平台的安全、稳定造

成了挑战。既要照顾初级用户，又要考虑高级用户，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先验可鉴，只能通过实践去获得经验，也只好委屈用户陪伴我们一起成长。‘数字北外’目前的不足，会随着大家不断的使用、提意见、调整而趋于完善。因为信息化建设重在服务，服务的对象就是大家，大家满意了，我的工作才能说是做好了。”他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北外’虽然是信息技术中心牵头建设的，但是70年的学校建设的成绩之一，更是全体的同事、同学、校友无私包容和理解，和我们一起充当探路人的成果之一。我希望70年校庆之后，北外的数字化校园能够建设得更加人性化，这需要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北外的e时代，应该是具有强烈北外特色、属于北外人的时代。在这个大潮中，我不是舵手，全体北外人才是。”

转载自北外《锐》杂志

五洲学子 共贺华诞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注册成立

秋风渐起的丰收时节，在全校师生及广大校友的期盼和关注下，我们迎来了母校 70 周年校庆。

为了推进北外的发展，弥补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不足，探索新的途径分担教育成本，学校从 2010 年上半年就开始酝酿和论证我校成立教育基金会的可行性。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学校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最终成功获得上级部门批准，并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正式注册成立。

基金会的宗旨是：通过接受捐赠进行奖教助学，促进学校发展。基金会将凝聚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力量，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积极开展业务活动，为推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具有外语优势和专业优势的国际化高水平人才做出贡献。

资金筹集初见成效

基金会成立后，学校积极地与社会各界展开联系，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筹措资源。很多事业有成、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的企业家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三亚华创美丽之冠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史维学先生、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方威先生、江苏浩利炜汽车市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孟超先生、PNJ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朴英祚先生、内蒙古义和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宽厚先生，以及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方仪女士等。在他们的支持之下，学校教育基金会先后成立了“中国公法研究基金”、“北京外国语大学思言行发展基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化战略人才培养基金”等子基金，即将成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货币与金融研究所发展基金”等。

更多校友已经开始行动！

我校英语学院 83 级、84 级校友分别向学校捐赠（折合）20 万元人民币；杨震校友捐赠 10 万元；83 级德语系校友程慧玲捐赠 10 万元；60 级英语学院校友集体捐赠四万两千元，更多校友参与了“北外年度捐献活动”，这些校友中有行业翘楚也有普通工薪阶层，捐赠款中（20 万元中）有人民币、美元也有欧元，但无论如何，在这些校友（83 级、84 级校友）身上体现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情系北外的精神，必将帮助我们最亲爱的母校——北外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您愿意开始行动么？

这里曾经是您求知问学的地方，这里曾经是您梦想启航的港湾，

这里有您年轻善感的回忆，这里有您深深敬爱的师长，

无论走到哪里，这里都将是您的精神家园，
母校为每一位北外人而自豪！

让我们一起贡献力量，为北外的成功努力！为北外的明天加油！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方法】

1、人民币账户

户名：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账号：0200007609026407232

2、外汇账户

户名：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知春路支行
账号：329856784411

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人员构成
理事长：杨学义

常务副理事长：彭龙

副理事长：钟美荪 文君

理事（排名不分先后）：于春迟 孙友忠 贾德忠 丁浩 张惠文 许晔 梅仁毅 殷桐生 张西平 万猛 应惟伟 何忠华 史维学 孟超

秘书长：应惟伟

监事：王仁成 路兴

喜迎校庆，回馈母校：我校英语学院83级校友集体为母校捐款

为庆祝北外70华诞，表达对于母校的祝福，我校英语学院83级校友集体为母校捐款20万元。3月12日上午，捐赠仪式在办公楼举行。党委书记、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杨学义，党委副书记姜绪范，党委副书记、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文君及英语学院83级校友出席捐赠仪式。仪式由财务处处长、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应惟伟主持。

党委书记杨学义致辞，对校友捐赠学校，支持学校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为校友在社会各界各行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感到骄傲。杨书记指出，本次捐赠活动是2011年以来我校的第一次校友捐赠活动，为母校70周年校庆捐赠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也是对去年年底成立的教育基金会的极大支持。杨学义书记向校友们介绍了学校近几年来在学科建设、校园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并期望校友们继续关注和支持母校发展。

83级校友的教师代表、国际商学院党总支书记高翠兰发言，为校友们捐助母校、感恩母校的行为表示感动，并感谢校友们长久以来在毕业生就业等方面给予的帮助。

杨学义书记与英语学院83级校友代表张铨签订了基金会捐赠协议，并代表学校接受校友捐赠的20万元支票。

随后，校友们纷纷发言，感谢母校北外的培养，表达对于母校70华诞的祝福，表示将继续关心和支持北外发展。新加坡星雅集团高级副总裁、本次校友捐赠活动的主要策划组织者张铨校友发言中表示，此次捐赠活动是英语学院83级同学对于母校70华诞的一份心意，通过这种形式传递了大家对于感恩母校、回报母校的一份心情。

党委副书记、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文君在发言中对

83级校友回馈母校的举动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学校成立教育基金会和校友总会等校友工作。文君副书记表示，学校将通过设立校友总会，不断完善组织机构，加强与校友的联系，充分获取广大校友对于学校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

仪式结束，校领导与校友们一起合影留念。

我校英语学院84级校友集体为母校捐赠

为庆祝北外70华诞，支持母校发展，我校英语学院84级校友集体为母校捐款二十万元。6月14日，捐赠仪式在办公楼举行。党委书记、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杨学义，财务处处长、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应惟伟，统战部部长、校庆办常务副主任刘宁，英语学院党总支书记王卫放出席仪式。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著名主持人梁洪作为84级校友代表出席仪式。党委副书记姜绪范出席了随后的招待晚宴。

杨学义书记首先致辞，对校友捐赠母校，支持母校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为校友在社会各界各行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感到骄傲。杨书记提到，今年是北外建校70周年，各届校友都在酝酿着为母校做贡献，这种捐助母校、感恩母校的行为令人感动。杨书记还代表学校向各位校友发出了诚挚的邀请，欢迎各位多联系校友，在9月24日的校庆日回母校看看。杨书记向校友们介绍了学校多年来在学科建设、校园建设等方面的十大变化，并期望校友们继续关注和支持母校发展。

随后，杨学义书记与英语学院84级校友代表周华军签订了捐赠协议，并代表学校接受校友捐赠的二十万元支票。

最后，84级校友代表陈岩发言，他回忆了当年在北外的点滴，感谢母校给予的一切，表达了北外学子心系母校、回报母校的拳拳赤子之心。校友们也纷纷发言，感谢母校的培养，表达对于母校70华诞的祝福，表示将继续关心和支持北外发展。

邵天任先生向我校捐赠珍贵俄文课本

4月2日，邵天任先生向我校捐赠了一本珍贵的俄文课本。这本俄文课本是1941年刻印的版本，并于1945年

由延安带回，包裹课本用的是 1940 年邹韬奋先生主办的《世界知识》杂志封面，具有珍贵的历史意义和价值。邵天任先生是 1941 年抗大俄文大队中目前唯一在世的教员，现已 97 岁高龄。

邵天任先生深情地向我们诉说这本俄文课本的故事：当时的延安，因国民党封锁，物资紧缺，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更别提学习俄文的教材了。在周恩来同志的关心下，通过美国派来的观察员带进的蜡版、油墨、刻刀纸，又由军委印制，才有了这本弥足珍贵的课本。这本泛黄的教材记载着邵先生的青春与热血，也见证我校发展初年的岁月峥嵘。

我校英语系 60 级校友向母校捐赠校庆礼物

拳拳学子心，眷眷母校情。我校英语系 60 级校友为庆祝母校 70 周年校庆，为母校捐赠精美的合成玛瑙地球



仪。9 月 2 日上午，捐赠仪式在办公楼 507 会议室举行。

参加仪式的校友代表有前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前驻英大使马振岗，前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原国防部外事办副主任孙启祥少将，前驻叙利亚大使时延春，高级记者桑洪臣，前外交部参赞金云、郑和康，前联合国高级政务官万经章，中咨公司原负责人张建海、前黄冈师范学院院长蓝葆春、前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乃芳、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杜学增等 12 人。校党委书记杨学义，党委副书记姜绪范、文君，校长助理、英语学院院长孙有中，英语学院党总支书记王卫放，校友办主任张惠文出席捐赠

仪式。仪式由校友办主任张惠文主持。

首先，校友代表、我校前校长陈乃芳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出席此次捐赠仪式的校友代表。他们都曾经奋斗在外交外事、教育、国防等领域，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之后，党委书记杨学义致辞，对英语系 60 级校友回到母校表示欢迎，对他们心系母校、关爱母校、支持母校表示衷心的感谢。杨学义书记向各位校友介绍了学校近年来的发展和变化，着重介绍了学校 70 周年校庆相关活动的筹备情况，并邀请各位校友代表在 70 周年校庆之际再回学校看看。

随后，杨学义书记与校友代表马振岗共同为英语系 60 级校友赠送学校的礼物揭幕。地球仪缓缓转动，寓意凡是有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就有北外校友的身影。英语系 60 级校友代表金云接受了学校颁发的捐赠证书。

英语系 60 级校友代表马振岗发言，对母校的培育之恩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表示，在母校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而且确定了人生志向，锤炼了意志，提高了修养。北外校友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他们的心始终和母校在一起。各位校友纷纷表示非常想念母校，感谢母校的培养，多年来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尽力，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没有辜负党和母校的教育。校长助理、英语学院院长孙有中也对各位校友重回母校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各位校友介绍了英语学院近年来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情况。最后大家共同祝愿母校越办越好！

北京外国语大学“我爱北外”校友年度捐献活动启事

亲爱的校友：

北外的岁月是我们一生的珍藏。为了让您的这份记忆化作永远与北外共在的鲜活影像，我们将开启“我爱北外”校友年度捐资活动。每年捐赠的人民币款额与母校建校的周年数相等（建校 70 周年捐 70 元、建校 71 周年捐 71 元，以此类推），如有意增加捐献金额者，额度不限。所有捐款将全部注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基金，由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用于参与母校建设、组织和开展校友活动以及应对突发性事件的爱心捐助等项目。每年的资金使用情况都将通过校友刊物《北外校友通讯》和校友网公布，以保证您的捐赠切实为母校的发展建设发挥作用。

作为此项活动的留念与答谢，您将得到一枚精美的纪念卡。纪念卡为印有母校标志建筑及建筑简介的书签。纪念品虽小，却寄托着您在母校的美好记忆，也记载着您对外校的深情回报。

本项活动本着自愿的原则参加，可以逐年捐赠（按建校年限捐献），也可以一次捐足四年全部款项（共计人民币 286 元），捐赠者将获全套四枚纪念卡联张。捐款者名单及金额将在《北外校友通讯》及校友网公布。

捐赠方式：

直捐：到学校校友办直接捐款，由校友办开具捐赠收据，并发放纪念卡。

邮寄：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办 刘蓉 收

邮编：100089

邮寄时请注明毕业年限、专业、班级并注明“年度捐赠”

汇款：帐户号码：802415052908091001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知春路支行

帐户名称：北京外国语大学

请注明姓名、毕业年级、专业并注明“年度捐赠”
海外校友捐赠外币：

收款人 (BENEFICIAR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开户行 (BANK):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BEIJING MUNICIPAL BRANCH

ZIZHUYUAN BANKING OFFICE

帐号 (ACCOUNT NO.): 0200007609026402172

Swift: ICBKCNBJBJM

由学校校友办向捐赠人邮寄捐赠收据与纪念卡。



2010年7月-2011年9月“我爱北外”校友年度捐赠名单

德语系 1981 级校友	程慧玲捐赠 10 万元	俄语系 1952 级本科、1955 级研究生校友丁士超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2 级校友	杨震捐赠 10 万元	英语系 1950 级校友	孙道章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9 级校友	陆光隆捐赠 1 万元	俄语系 1958 届校友	贾柏青、李永芳年度捐赠 800 元
英语系 1971 级校友	张万海捐赠 500 美元	俄语系 1952 级校友	王荫堂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8 届校友	集体捐赠 585 元	俄语系 1955 级校友	陆佳才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61 级校友	蒋巧云年度捐赠 280 元	英语系 1951 级校友	周钟型年度捐赠 70 元
俄语系 1959 级校友	孙英玉年度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56 级校友	黄任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9 级校友	于书彦年度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50 级校友	李潞年度捐赠 100 元
留苏预备部 1959 级大 23 班、30 班校友马汝骏年度捐赠 274 元		英语系 1957 级校友	安永玉年度捐赠 300 元
留苏预备部 1959 级校友	潘真颖年度捐赠 274 元	英语系 1951 级校友	程瑞声年度捐赠 1000 元
留苏预备部 1959 级校友	冯宝胜年度捐赠 67 元	俄语系 1960 届校友	邵玉铮年度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50 级校友	李潞年度捐赠 300 元	日语系教师	张慧芬年度捐赠 68 元
英语系 1951 级校友	金永健年度捐赠 274 元	俄语系 1949 级校友	陆法濂年度捐赠 300 元
东欧语系 1971 级捷克语专业校友田赶生年度捐赠 274 元		英语系 1964 级校友	杨清宗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8 届 2 班校友	蔡发荣、卢慧英夫妇年度捐赠 1000 元	亚非学院斯瓦希里语 1964 级校友饶少平年度捐赠 800 元	
俄语系 1958 届 1 班校友	孙枋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9 届校友	陈怀义年度捐赠 69 元
俄语系 1958 届校友	李允涛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8 级校友	杨逸娴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8 届 1 班校友	赵军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8 级校友	孙伯戡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8 届 1 班校友	王素珍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8 级校友	夏振岱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8 届 5 班校友	刘长庚年度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夏堃堡年度捐赠 278 元
俄语系 2002 级校友	尹洁年度捐赠 2000 元	英语系 1951 级校友	周钟型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9 级校友	赵从光年度捐赠 278 元	西语系 1961 级校友	张伯晶年度捐赠 300 元
		阿语系 1986 级校友	周玲年度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50 级校友	江承宗年度捐赠 300 元
		德语系 1961 级校友	吴麟绶年度捐赠 365 元
		英语系 1956 级校友	刘道义年度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59 级校友	刘玉仙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5 届 37 班校友	宋正昆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5 届 44 班校友	黄淑琳年度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60 级校友	王霖年度捐赠 350 元
		德语系 1958 级校友	刘美琪年度捐赠 900 元
		德语系 1958 级校友	王起龙年度捐赠 300 元
		德语系 1958 级校友	冯中林年度捐赠 150 元



俄语系 1958 届校友	苏炳昌年度捐赠 10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孙晓兰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8 届校友	洪文秀年度捐赠 10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纪绍祥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8 届校友	刘登锐年度捐赠 274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任录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60 届校友	叶钟灵年度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任泉捐赠 300 元
英语系教师	应曼蓉年度捐赠 10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任厚坤捐赠 300 元
亚非学院斯瓦希里语 1964 级校友	饶少平年度捐赠 10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权文有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5 届校友	顾济男年度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朱曼丽捐赠 1000 元
英语系 1965 届校友	徐闰生年度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宋秀英捐赠 10000 元
法语系 1965 届校友	刘士义年度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宋淑贞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50 级校友	李潞年度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宋增寿捐赠 300 元
俄语系 1954 级校友	殷松龄年度捐赠 282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沈锡飞捐赠 300 元
留苏预备部 1959 级校友	周民兴年度捐赠 1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李士君捐赠 300 元
法语系 1965 级校友	贾峰年度捐赠 10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李世文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孙启祥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李长和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顾济男年度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李季芳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徐润生年度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李美莹捐赠 25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万经章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李群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马国英校友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李德华捐赠 10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马振岗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李燕殊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王凤珍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吴一安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王玉琳捐赠 10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吴宝国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王学贤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吴贵芳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王英凡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吴前伟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王维扬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吴祯祥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刘玉芬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邹明蓉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刘东海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汪耀祥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刘治琳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杜学增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刘明臣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时延春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刘宝莱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谷立栋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刘润清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孟宪英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刘俊宝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肖正荣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申相坤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张凤琨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孙必干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张建海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孙本志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张丽英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孙慧敏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张晋南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张振芳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张勤朴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张毓霖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金云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金寿祥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金振达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郑和康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陈乃芳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陈文照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林坤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赵公昌捐赠 25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赵宇真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赵琦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屈伯德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姜金花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姜恩柱捐赠 10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候清儒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郭建平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徐寿官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唐承元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高桂芝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常明玉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桑洪臣捐赠 10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夏堃堡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陆培敏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曹杏珠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梅平捐赠 5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戚文琴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焦乃智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董桂兰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崔丽娟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蓝葆春捐赠 300 元
 英语系 1960 级校友 戴桃珍捐赠 300 元





英语学院83级校友捐赠仪式会场



我校领导代表学校接受校友捐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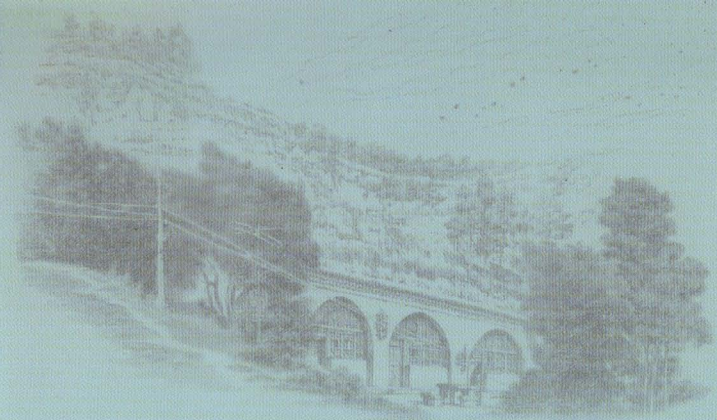
1949年外国语学校校友捐赠“校史写意组画”



英语学院84级校友捐赠仪式会场



英语学院60级校友集体为母校捐赠地球仪



为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七十周年，

一批老校友特意邀请专家画成一组北外校史写意画六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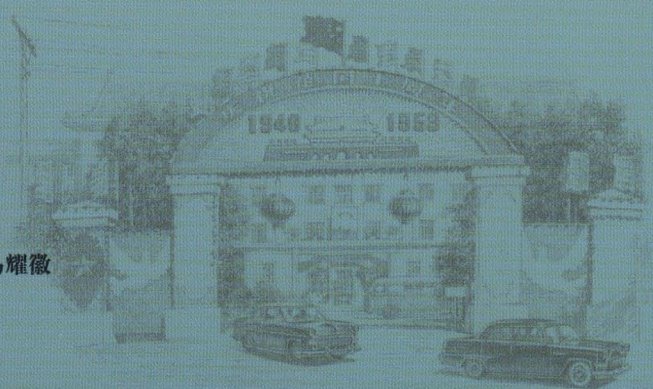
送给母校，

其用意在于不忘母校曾经走过的七十年艰难道路；

同时还印成一组纪念封和纪念卡，

用以收藏和交流，

让母校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策划：郭健，韩效琦，闻林，宋以敏，马耀徽

校史画作者：老伍

纪念封和纪念卡设计：伍佩衡，黄燕